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GWHHSZS

中国古代民族

李清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中国古代民族

李清和

060323



女子学院 0006308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责任编辑 王 君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苏彰秦

中国古代民族

李 清 和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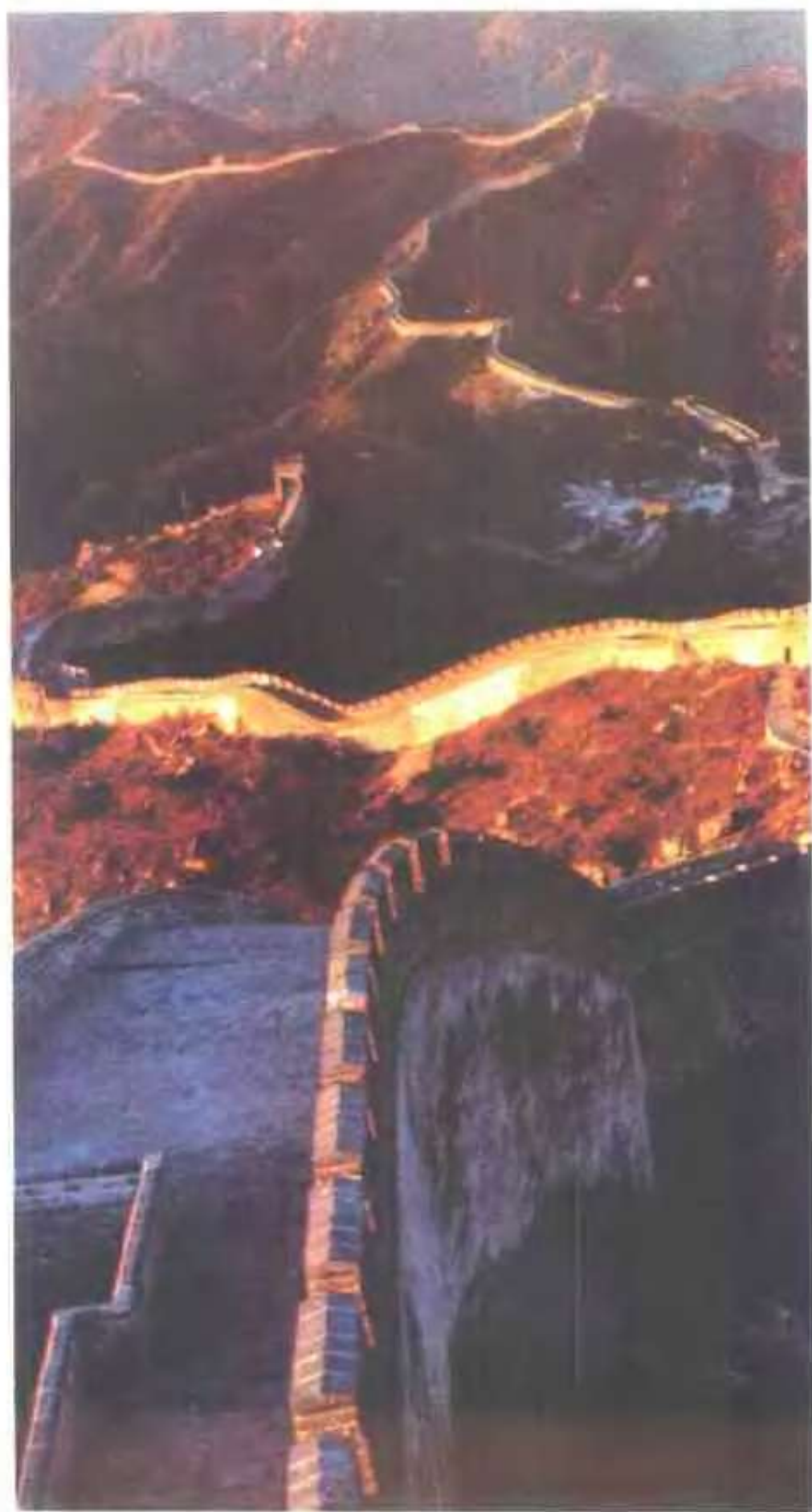
787×960 毫米 32 开 4.5 印张 59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035-0512-5/G · 28

定价: 2.30 元



万里长城—中华民族的象征



成吉思汗
(1162—1227),
中国古代蒙古族杰出的首领、
军事家和政治家

康熙帝
(1654—1722),
在加强多民族
国家的统一和
推动社会经济的
发展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贡
献。



河南伊川
县唐墓中出土
的唐三彩胡俑



东胡及东
胡后裔乌桓、
鲜卑和契丹有
髡头的习俗。
这是内蒙古库
伦旗七号辽墓
壁画的墓主人，
代表了契丹族
的上层人物。



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乃为公主筑一城以琿后世”。这一“城”便是最初的布达拉宫。

清高宗所
颁《金瓶制签》
之金瓶



编者献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长期

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摈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

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
•
的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110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年2月22日 北京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主编：冯钟芸 游铭钧 焦树安*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 | | |
|------|------|------|
| 戴念祖 | 郭齐家 | 金宜久 |
| 李思敬 | 卢海燕* | 骆桂明* |
| 马樟根 | 欧阳中石 | 庞 朴 |
| 戚志芬 | 任雪芳* | 沈心天* |
| 谭其骧 | 汤一介 | 王世民 |
| 王兆春 | 吴恩扬 | 吴 可* |
| 吴良镛 | 严如娴 | 张华纲 |
| 张明华* | 张习孔* | 赵 靖 |
| 赵匡华 | 钟碧惠 | 周 强 |
| 朱光暄 | | |

〔有*者为执行编委〕

●责任编辑／王 君

●装帧设计／王 岐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过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与生活习俗等12个方面，分110个专题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ISBN 7—5035—051

G·28

定价：



目 录

| | | |
|----|---------------------|-----|
| 一 | 中华民族 | 2 |
| 二 | 中国大陆与古代民族人口分布 | 13 |
| 三 | 从攫取经济走向生产经济 | 25 |
| 四 | 共同祖先 | 37 |
| 五 | 伟大的变革 | 48 |
| 六 | 秦汉大统一 | 61 |
| 七 | 南北同步 | 74 |
| 八 | 隋唐大统一 | 87 |
| 九 | 势均力敌 | 100 |
| 十 | 元明清大统一 | 113 |
| 十一 | 中华民族正在振兴 | 127 |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每当我们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我们自然知道，中华民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的总称，是指我国各族人民而言的。但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话，你就应当根据中华民族的现状，去追溯中国古代的民族。须知中华民族浓缩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她是所有中国古代民族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一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由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等 56 个民族构成，据 1990 年统计，共有 11.33682501 亿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1/5，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东部和中部。现在我们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看一下中华民族的面貌。

从人口结构看：汉族拥有 10.42482187 亿人（1990 年），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2%；其余 55 个少数民族共有 9120.0314 万人（1990 年），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8%，其中壮族人口达 1000 万人以上；人口在 500 万以上、1000 万以下者有

回、维吾尔、彝、苗、满、土家 6 个民族；人口在 100 万以上、500 万以下者，有藏、蒙古、布依、侗、瑶、朝鲜、白、哈尼、哈萨克、傣、黎 11 个民族；人口在 10 万以上、100 万以下者，有傈僳、畲、拉祜、水、东乡、纳西、土、景颇、柯尔克孜、羌、佤、达斡尔、仡佬、仡佬、锡伯 15 个民族；人口在 1 万以上、10 万以下者，有撒拉、布朗、毛难、塔吉克、普米、怒、阿昌、鄂温克、乌孜别克、德昂、京、基诺、裕固、俄罗斯、保安 15 个民族；人口在 1 千以上、1 万以下者，有门巴、珞巴、独龙、鄂伦春、高山族、塔塔尔、赫哲 7 个民族。

从分布地区看：汉族分布于全中国，主要聚居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55 个少数民族除满、回、蒙古等民族有少部分分布于全国各地外，基本上都分布在边疆。民族分布的总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分布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有满、朝鲜、赫哲、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东北三省汉族占 90% 以上，少数民族占 10% 以下；内蒙古自治区汉族占 85%，少数民族占 15%。分布于西北地区的主要有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藏、裕

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甘肃省汉族占90%以上，少数民族占10%以下；青海、宁夏两省汉族占60%以上，少数民族占40%以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占40.4%，少数民族占59.6%。分布于西南地区的主要有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民族。四川省汉族占95%以上，少数民族占5%以下；云南省汉族占60%以上，少数民族占40%以下；贵州省汉族占74%，少数民族占26%；西藏西藏自治区汉族占4.8%，少数民族占95.2%。分布于中南、东南地区的主要有壮、瑶、仡佬、毛难、京、土家、黎、畲、高山、苗等民族。高山族聚集在台湾省，黎族聚集于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汉族占60%以上，少数民族占40%以下，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四省汉族占95%以上，少数民族占5%以下。

从使用语言文字看：我国各民族分属5个语系：属汉藏语系的有汉、壮、傣、布

依、侗、仡佬、水、毛难、黎、藏、门巴、彝、傈僳、纳西、哈尼、拉祜、基诺、白、羌、普米、珞巴、怒、阿昌、景颇、独龙、苗、畚、瑶、土家、仡佬 30 个民族；属南亚语系的有佤、德昂、布朗 3 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高山族；属阿尔泰语系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撒拉、柯尔克孜、裕固、乌孜别克、塔塔尔、蒙古、土、东乡、达斡尔、保安、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 17 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塔吉克、俄罗斯 2 个民族。京语、朝鲜语语系未定。汉语文是汉族使用的语言、文字，汉语虽有多种方言，但反映在文字上却是共同的汉文。汉语文为全国大多数民族所通用，即使惯用本民族语文，也兼会汉语文，才能与全国其它民族进行交流。中国现有 27 个民族共使用 39 种文字。其中汉、回、满 3 个民族通用汉文。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俄罗斯等 12 个民族从历史上沿用至今的民族文字共 16 种（其中蒙文 2 种、傣文 4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广西等地少数民族中的部分群众曾使用过傈僳文（两种）、方块苗文、佤文、方块壮文、方

块瑶文、方块白文等 7 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为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黎、佤、纳西、白、土等 11 个民族创造了 15 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创制文字依据方言,如苗族三个方言创制了三种文字)。如果再加上现已停止使用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字 17 种(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二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文、契丹文中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满文、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水书),中国各民族共有 56 种文字。所有这些文字可分为非字母文字和字母文字两大类:非字母文字包括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楷书化汉字、音节文字等古今 14 种民族文字。其余属字母文字,即拼音文字。

从经济发展类型看:在 1949 年以前,汉族聚居地区或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均有发达的封建农业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发展。从事农业为主的民族有汉、回、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傣、黎、畲、高山、水、东乡、纳西、佤佬、

羌、撒拉、毛难、仡佬、阿昌、普米、德昂、保安、门巴等民族以及部分蒙古族、藏族、达斡尔族、土族、鄂温克族；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和部分蒙古族、藏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乌孜别克族、土族、锡伯族从事畜牧业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此外，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广西边缘地区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京族从事渔猎经济；而分布在西藏、云南偏僻山区的独龙、珞巴、怒、傈僳、佤、布朗、基诺、景颇、拉祜等民族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采集和“刀耕火种”农业的经济成份。

从社会形态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东南沿海以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为代表已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汉族聚居区的广大农村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彝、黎等民族的大部分以及藏族的一小部分，封建地主制社会经济形态占优势；大部分藏族地区和部分傣、维吾尔等民族地区，共约

400 多万人,存在着封建农奴制;居住在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地区的部分彝族地区,约有100 万人,保存着奴隶制度;另外,独龙、怒、傈僳、布朗、基诺、景颇、佤、拉祜、珞巴、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全部或一部分,约有70 万人口,还多少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如独龙族和部分鄂温克族的社会成员按家庭公社进行生产和分配,土地山林基本上属于家庭公社所有,共同劳动,全部收获按户或按人平均分配;而西盟佤族、傈僳族等则代表着阶级社会前夜的过渡状态。

从政治制度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普遍实行省、县制外,还同时保留着种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如在汉族地区残留着族权、父权和夫权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内蒙古保留着由世袭封建王公统治的盟旗制度;在西藏存在着政教合一制度;在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奴隶制下由头人进行统治的家支制度;在云南景颇族地区存在着将成员分为官种(贵族)、百姓、奴隶三个等级,并由官种出身的山官为首进行统治的山官制度(贡萨制度);在青、

甘、川、滇的某些民族地区(如藏族聚居区)还保留着拥有行政权力的土司、土官制度(农业区)和千户、百户制度(牧区);在新疆的一些民族地区,也残留着类似性质的伯克制度。

从生活习俗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形成各民族的共同生活习俗外,也还保留着很多地区性、民族性的生活习俗。如服饰,除流行全国的以中山装为代表的中式服装外,尚有绚丽多采的旗袍(满族妇女的长袍)、蒙古袍(蒙族)、藏袍(藏族)、擦尔瓦(彝族男女的披衫)、统裙(即桶裙或筒裙,傣族妇女的传统服装)、百褶裙(彝、傈僳、普米、苗等族妇女的衣裙)等;饮食除自成系列的中餐外,尚有独特民族风味的糌粑(藏族主食),烤饕(náng 囊)、抓饭(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民族的主食),手扒肉(蒙古族),酥油茶(藏族),奶茶(蒙古族等),马奶子(蒙古族),炒鱼毛(赫哲族),朝鲜冷面(朝鲜族)等;住宅除独具风格的中式建筑外,尚有适应不同需要的蒙古包(蒙古族),帐篷(藏族),仙人柱(鄂伦春、鄂温克族),长房(基诺族),干栏式建筑

(壮、傣、布依、侗、水等南方民族)等;交通工具除通用的车、船、马外,尚有适用各种自然条件的马帮、驼队、滑雪板、扒犁(雪橇)、桦皮船、溜索等;婚俗家庭方面除普遍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婚俗和个体家庭外,尚有原始婚俗家庭残留下来的串姑娘、公房、不落夫家、“阿注”(伴侣)婚、母系家庭、双系家庭等;丧葬习俗方面除通行的传统土葬外,尚有水葬、火葬、天葬、野葬、塔葬、树葬、崖葬等;节日除共度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外,很多民族尚有自己的节日,如那达慕大会(蒙古族),龙船节(苗族),目脑节(景颇族),火把节(彝、白、哈尼、纳西、普米、傈僳、拉祜等民族),泼水节(傣族),三月街(白族),旺果节(藏族)、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文体活动除中乐、中华武术外,尚有富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戏剧,如龙灯、旱船、高跷、耍狮子、压跳板、荡秋千、摔跤、赛马、射箭、划龙舟、刁羊、姑娘追等等。

从宗教信仰看: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在1949年以前,我国的宗教除了中国创立

的道教以外,尚有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佛教由于中国化并长期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少数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有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仰小乘佛教的有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及佤族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民族;信仰基督教的有部分彝族、苗族以及云南西部的部分民族;信仰东巴教的有纳西族;信仰东正教的有俄罗斯族及鄂温克族的一小部分,此外,在独龙、怒、佤、景颇、鄂伦春等民族中尚保留着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等,而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

综合以上诸方面,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决不是 56 个民族简单相加后的总和,而是一个具有多种内在有机联系的牢固整体。汉族是主体民族,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发展水平也最高,与各个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的局面;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大杂居中小聚居于某一边远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一

般说来,距内地愈远、交通愈不方便,发展也就愈迟缓。故少数民族需要汉族的帮助,汉族也需要各少数民族的支援,汉族与少数民族是亲密的兄弟关系,这并非只是亲昵的比喻,实际上它们都缘于中国古代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民族一方面混血成汉族,另一方面孕育成今天的少数民族,这期间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是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共同缔造祖国的文化中融汇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二 中国大陆与古代民族 人口分布

中国大陆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它位于北半球、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地域辽阔，横跨东经 60 多个经度，纵越北纬 50 多个纬度。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处在北纬 4°附近。北回归线（北纬 23°27'）穿越大陆南部。从地质生成史与自然地理看，中国大陆具有极其显著的特点：

第一，中国大陆东临海洋，其余则为山脉环绕，基本上是在山水环抱之中，从而自然而然地与其它地区分离开来，自成一体。

第二，中国大陆内部西高东低，呈现为三个阶梯：青藏高原为地势最高的一级阶梯，海拔多在 4000 米以上，空气稀薄，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但高原内部被分割出的盆地与河谷，如柴达木盆地、雅鲁藏布江谷地等，又别具特色。青藏高原往北至阿尔泰山，往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一线,属地势的第二阶梯,海拔多在 1000 米至 2000 米之间,其中被山河分割成的高原与盆地互相穿插,如自西至东有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渭水平原、汾水谷地、河套平原等;自北至南有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秦岭、汉中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形成极其复杂的地形。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直至近海的大陆架,属地势的第三级阶梯,海拔多在 500 米以下,地势平坦,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北至南联为一体,五岭以南为丘陵山地。西高东低的三个阶梯,直接影响到绝大多数江河西源东流。

第三,中国大陆的位置和内部地形结构,直接影响到气温和年降雨量。 0°C 的等温线大致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向东经秦岭、淮河一线,把大陆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除台湾、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外,绝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北方由暖温带(黄河中下游地区)、中温带(东北、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直至寒温带。年降水量 400 毫米线大致从大兴安岭西坡经张家口、兰

州、拉萨，到喜马拉雅山一线。这条线东南年降水量在 400 毫米以上，西北部年降水量逐渐递减至 200 毫米以下，故整个北方地区可区分为湿润区（北方沿海）、半湿润区（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与青藏高原东南部）、半干旱区（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干旱区（新疆、蒙古高原西部、青藏高原西北部）。当然，这只是大体划分，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西南有终年积雪的高山，中国大陆的热极反而在新疆的吐鲁番。特别是历史变迁，如北方上古时代有很多泽薮，著名的有猪野泽（今甘肃境），弦蒲薮、焦获、杨纡（均在今陕西境）、荥泽、圃田泽、逢泽、孟猪泽（均在今河南境），雷夏泽、菏泽、大野泽、猋养泽（均在今山东境），云梦泽（今湖北境）等，后来都不见了，说明古代黄河流域温和湿润，水量丰富，以后变为寒冷干燥。据研究，大约以公元 1000 年左右为分界线，以前虽在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与公元 3 世纪至 5 世纪出现过寒冷期，但气候基本上是温暖的；而以后则基本上以寒冷为主了，特别是 12 世纪和 17 世纪，是最寒冷的时期。地质学和考古学更证明更

新世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冰川的前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华北地区位于寒温带、温带区域与亚热带区域之间，属于过渡地带，故受冰期、间冰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影响尤为强烈，从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至少出现过五个冷期和四个暖期。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气候差别不大，从晚更新世起，其差别才越来越明显。而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变化不如北方显著。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炎热、雨量充足，属亚热带温热潮湿气候，大致接近于今两广、云南地区的气候，黄河流域亦非常温暖湿润。

第四，中国大陆复杂的地形、气候、雨量和土壤，使得这块土地上物产丰富，生物品种多样。地球上绝大多数动植物都能在中国大陆得到适应的生长地点，局部地区足以构成完备的生态环境。大体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处黄土地带，土质疏松，含矿物质多，自然植被以耐干旱的蒿属草本植物居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茂密，又广泛生长着水生植物

和湿生草木；华南地区为热带雨林；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除山地丘陵为森林覆盖外，主要是浩瀚的沙漠和草原。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适宜于人类的生存，特别是第二阶梯的复杂结构，是人类起源和人类早期活动的理想环境。云南发现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表明中国大陆西南部是人类发祥地之一。至今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共 200 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各阶段的人类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地点目前共发现四处，其中距今 180 万年的西侯度文化（山西省芮城县）位于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带；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遗址（云南省元谋县）位于云贵高原；小长梁和东谷坑旧石器地点（均在河北省北部）大约距今 100 万年，位于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旧石器早期中、后阶段的石器地点，以距今 70 万年至 20 万年左右的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稍早于北京人文化的有蓝田人文化（陕西蓝田县）和崧（kē 科）河文化（山西芮城县），稍晚于北京人文化的以大荔人文化（陕西省大荔县）与许家窑人文化（山西省

阳高县)为代表,发现数量显著增加。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地点数量更多,以丁村文化(山西省襄汾县)为代表,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但依然集中于黄河中游以及渭水、汾水流域。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布中国大陆的河谷和湖边,黄土高原已到处发现,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东北地区向北延伸至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黑龙江省呼玛县),从第二阶梯向西扩展到青藏高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霍霍西里(青海省)、定日(西藏定日县)、申札(西藏申札县)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物;向东南一直扩展到台湾省,发现了左镇人(台湾省台南县)和长滨文化(台湾省台东县)遗址。

同样,中国大陆也适宜于人类的发展,是人类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大好场所。分布于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面貌多样,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各有创新。截止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7000多处,其中经过发掘的约400多处,它们大多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文

化大约从公元前 6000 年起,延续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早期新石器文化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三个遗址为代表,出现手制陶器、炭化的农作物黍、粟和猪、狗等家畜骨骼。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内蒙古南部与湖北西北部一带,年代约为公元前 4500—公元前 2500 年(校正:前 5000 年~前 3000 年),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显著特征,农作物除粟、黍等耐旱作物外,还种植蔬菜,家畜有猪、狗、鸡,过定居生活。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是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包括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先后相承。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一带,先后存在的新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主要有马家窑文化(甘肃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多年起,延续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江汉地区主要有分布

于川鄂交界地区的大溪文化,分布于鄂北豫南的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下游地区主要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南京一带的阴阳营文化为代表,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家畜有猪、狗、水牛。在草鞋山遗址(江苏吴县)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三块残布片,是中国目前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在北方地区从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分布着细石器文化。其中以分布于辽宁东南部的新乐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东部的富河文化以及分布于辽宁、内蒙古、河北交界地区的红山文化最典型。在这里代表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往往与细石器或其它类型的陶器一起被发现。另外,在华南的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发展迟滞,其共同特征是,各遗址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普遍使用器形简单的绳纹粗陶,未发现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痕迹,只到新石器晚期,才在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曲江石峡发现了稻草与稻谷。西南云、贵、川、藏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不多,资料也比较零散。

中国大陆是古代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分布在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先民,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也由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夏以后相继建立国家,走在各个地区的最前列,成为最先进的地区,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构成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心。商朝以“大邑商”为中心,称四周的土地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是为四土;称四周的不同部落为方,见于甲骨文记载的有三十多个方国,如在商西北方向有土方、舌方、鬼方、羌方,在商之南有人方、虎方,是为四方。周朝以周土为中土,以周国为中国,而对四边各地区的氏族部落或民族,往往对局部地区各氏族部落的共同特点予以泛称,如称东部沿海地区的各氏族部落为东夷,“夷”字从大从弓,意为带弓的人,是猎人的形象,大约是以渔猎为生的缘故;称西方延及西南地区的各氏族部落为羌,“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大约是以畜牧为生的缘故;称南方江汉地区的各氏族部落为南蛮,“蛮”字从虫,以其采食虫鱼之故。遂有所谓东夷、西羌、南

蛮、北狄之说，当然其中也含有歧视其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的意味。除泛称外，亦有具体所指，如严允、犬戎等。这直接影响到整个古代对周边各族的称呼，不过，总的趋势是从泛称愈来愈趋向于具体称呼，正反映出民族形成的过程。自秦汉以后，如果从自然地理来区分，大体可分为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

北方民族可分为三个地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古代民族进行活动。东北平原最早见于记载的有肃慎、涉貉系统各部落，后来主要有夫余、高句丽、勿吉、靺鞨、挹娄、奚、渤海、女真、满洲等；黄河以北至蒙古高原最早见于记载的有北狄系统各族，其后主要有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薛延陀、契丹、室韦、靺鞨、蒙古等；西北由黄土高原延伸至今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最早见于记载的有氐(dī 低)羌系统各部落和诸戎部落，其后有羯、氐、羌、月氏、塞种、西胡、乌孙、丁零、坚昆、突厥、铁勒、葛逻禄、回鹘、吐谷浑、党项等。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最

早见于记载的有三苗、九黎、群蛮系统，其后有盘瓠(hù 户)蛮、廩君蛮、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南郡蛮、巴郡蛮等。由长江下游向西南延伸至岭南和云贵高原部分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为百越系统各部落，其后主要有东瓯(ōu 欧)、闽越、西瓯、骆越、南越、山越、蛮、俚、僚等。西南云贵川藏地区，百越系统、百濮(pú 仆)系统、氐羌系统各部落交错杂居，民族成份极其复杂，秦汉时统称西南夷，主要有蜀、巴、叟、僰(bó 博)、哀牢夷、乌蛮、白蛮、吐蕃等。

综观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的历史地理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民族数量看，南方民族远远超过北方民族，南方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远远胜过北方民族。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民族问题的焦点却在北方，特别集中在沿长城一线，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民族交往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历代统治者修建长城，并围绕长城一线处理民族问题，只要北方民族问题解决了，南方民族问题就迎刃而解，故长城是形成中华民族的纽带，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民族

迁徙的总趋势是由北向南流动,而且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又往往与气候将入寒冷期重合在一起,上面提到的四次寒冷期分别导致西周末年春秋时期、汉魏两晋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这又是为什么?以上两个问题绝非历史的偶然巧合,但也不能像对“南人巢居,北朔穴居”,百越“断发”、“裸形”,羌人“辫发”、“袒臂”那样,完全根据自然条件即可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是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当研究一下中国大陆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历史发展。

三 从攫取经济走向 生产经济

中国大陆先后在四个阶段出现过四种经济类型。在旧石器时代,由木石天然工具到定型化,直到距今 28000 余年的峙峪遗址出现的石镞(zú 族),生产工具也无非是斧、刀、矛、弓箭之类的木、石、骨、蚌器,用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所进行的采集、捕鱼、狩猎等项生产活动,都是把大自然的动植物产品拿过来直接供人类自身的消费、故称为攫取经济。到新石器时代,已从采集、狩猎中发展起农作物培植和动物饲养,如南方河姆渡文化已开始水稻种植和饲养猪狗等家畜,北方仰韶文化也开始黍、稷的种植,和饲养猪、狗、鸡等家畜,与此同时,还发展起工具制作、制陶、纺织、建筑等手工业,于是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很显然,其产品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生产出来的,故称为生产经济。但这

时生产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仍以攫取经济为主,表现为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经济和攫取经济并举,可以称作原始型的综合经济。到新石器末期直至金石并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具体称为龙山文化直至夏商西周时期,这时生产经济逐步发展,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形成了谷物以粟、稻等土著农作物为主,农具以耒耜、石刀为主的农业。同时,新石器晚期所饲养的马、牛、羊、鸡、狗、猪等六畜,到商代均已培育成特征稳定的品种。尽管如此,由于生产工具仍然保持木、石、骨、蚌器,限制了生产经济的规模,故采集、渔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表现为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的同时并举,可以称作发展型的综合经济。西周后期,分布于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严允、戎、狄诸部落,充分利用大草原的自然优势,首先走向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经济,接着于春秋以后,随着牛耕和铁器的出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可并称为生产经济类型。

以上四种经济类型在中国大陆带有普遍性,表现为依次发展的四个阶段。举例来

说,人们往往以为细石器文化是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其实不然,细石器文化各遗址都是典型的原始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最能说明问题。夏家店下层文化,据放射碳素断代,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相当于夏商时期。其自然环境为大面积的暖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森林区。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磨制石铲、石刀和打制石锄的出现,说明人们在森林边缘种植谷物,动物遗骨表明,当时除饲养牛、羊、猪、狗等家畜外,也猎获鹿科动物。生活在林区,采集活动当然是频繁的,陶器和大量金属、玉石装饰品足以说明手工业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已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它属于发展型综合经济是确定无疑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属北方青铜器晚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1000—前300年,青铜武器有刀、矛、短剑、镞等。青铜工具有斧、凿、锥等。石器中已没有用于掘土或松土的锄、铲等农具,可见已不进行农业生产,仅见的半月形收割工具,很可能是割草用具。牧畜有牛、羊、猪、狗、马等,从青铜马具和骨刻图象看,马是

用于坐骑或拉车的，是大规模放牧的工具，正如农业中的耕牛一样。由此即可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已进入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经济类型。

应当看到，从攫取经济过渡到综合经济是一场技术革命。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从萌芽状态到茁壮成长，可以提供愈来愈多的产品，使人们除了维持生存之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富余。于是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同时发生变化，原始综合经济把母系氏族社会推向繁荣阶段，人们也从游动状态走向定居，形成了彼此独立的许多聚居点，如同西安半坡遗址一样。而发展型的综合经济则使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最终以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在这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已不是原始民主平等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是呈现为阶级结构的地缘关系了。现在我们着重谈一下这场技术革命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在单纯的攫取经济中，只存在人和自然的交换，及至过渡到原始综合经济和发展型的综合经济，才逐渐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交换。到后来，除近距离的“日中为市，交

易而退”之外，交换活动还辗转波及到整个中国大陆。从考古发掘看，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海贝，来自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制作玉器的玉石材料，又来自遥远的大西北；而大汶口文化中象牙制品的象牙原材料，也显然是来自南方，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交换活动的范围就已扩展到全中国，以后只是交换规模越来越大，交换范围越来越广而已。在先秦时代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大陆的自然地理特点，决定这种全中国性的交换活动只能沿着纵列南北的三大平原和横贯东西的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所形成的陆路交通进行。这样，中原地区就成了全国各地进行交换活动的必经之路，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中国大陆的交往中心。不言而喻，各地创造出来的文明也随着交换活动的发展在这里汇集凝聚起来，遂促使中原地区获得超越其它地区的更迅速的发展，很快便由中国大陆的交往中心发展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了。从此，中国大陆便构成一个具有种种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为建立统一的国家打下了基础。同时

又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大陆内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中国大陆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使各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其跟中心地区关系的疏密为转移,凡离中心地区近或交通方便的地方,其发展速度就快,反之,就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迟滞状态。另一方面又导致中国大陆内部各地区的社会分工,使各地区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不必为自身的需要所局限。因为自身需要而本地生产又特别费力的产品,完全可以通过交换获得,这样,即可作到地尽其宜,正如元朝农学家王桢在《农书》中所述:“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于是促成了许多地方特产,特别是逐步促成了农业区和畜牧业区的分工。

同样,从发展型的综合经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或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经济也是一场技术革命。很显然,从数量有限的家畜饲养到大规模的成群放牧,是一个根本的转变,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并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光是选择培养适宜于成群放牧的牲畜,就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先前

家畜饲养以猪、狗、鸡为主，及至成群放牧却以牛、马、羊为主了。此外更毋庸说游牧与定居饲养是截然不同的了。至于农业，从使用木、石、骨器到使用铁器，从集体协作到个体牛耕，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轮耕到大规模开垦，就更是根本变革了。它不仅需要积累广泛的知识，如天文、气象、水利、土壤、施肥、农艺等等，还需要冶金、工具制造等多种手工业部门相配合。可见实现以农业为主比实现以游牧为主还要困难得多。不过，在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孕育伊始，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而加速了各自的进程。不言而喻，没有中原地区的高度发展，以提供足够的生活用品，要使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居民由综合经济转变为游牧经济是困难的；当然，没有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源源不断地提供大牲畜，中原地区要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造也是困难的。毫无疑问，由综合经济分别转变为农业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正是在互相促进中完成的。这就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率先跃入游牧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跃入农业区的根本原因。黄河中下游地区、黄

土高原、蒙古高原一旦变为最先进的农业区、游牧区之后，这些地区便立即展开了居民由点向面的胜利进军，一方面使亘古茫茫的荒原变成“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景象，另一方面又使千古沉睡的土地被开辟为具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双方的天然分界线在长城一线。当然，这种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并不是绝对固定的，长城的历史变迁固然能说明问题，但这是常规范围内的气候变化，一遇到前面所说特异寒冷期，农牧业最适区域的分界线会南移至今黄河一线。着眼于经济的角度，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内迁就并非偶然了，何况他们又是沿着交换路线的向心运动呢。

黄河中下游地区先进农业区与蒙古高原先进游牧区的形成，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须知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类型。在畜牧业中，人类劳动用于动物生命的生产，即有计划地把通常很快就枯萎、死亡、腐烂的天然植物饲料经过放牧转变为牲畜的蛋白质、脂肪、皮毛、骨头等等，从而使植物所积蓄的太阳能转移给家畜，以变

换了的形式继续加以保存,为人提供充足的衣食来源,所以畜牧业需要的劳动条件是水草丰美的原野,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牲畜。在农业中,人类劳动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即把自己精心培植的农作物种子拿出一部分直接播入耕地,于是重新生长成的农作物在多种护理下,便通过自然界的存在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等要素以及作为肥料加进来的各种物质,把太阳能变换成化学能。在变换中,人们还部分地采用机械手段加以促进,致使农作物收获量数十百千倍地增长,为人提供充足的衣食来源。故农业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为种子、生产工具和耕地,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是多种多样的。基于这一点,农业和畜牧业的劳动组织以及生产方式就判然有别了。比如“逐水草迁徙”是游牧业的正常状态,而不停地流动对农业来说正是破产的象征,农业生产首先需要安定。二者是相反的,但是二者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互为补充,真可以说是“相反相成”,这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经济一分为二。如果说中国大陆第一阶梯和第二

阶梯的局部平原、河谷、盆地的经济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进农业为标兵，属于潜在农业区的话，那么第二阶梯的其余部分和第三阶梯的经济发展就以蒙古高原的先进游牧业为标兵，属于潜在游牧区了。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运动处于农业和游牧业的对立统一中，而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首当其冲，集中表现出对立统一的经济运动。这一态势制约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更制约着中国古代民族的发展。

民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中国古代民族正是古代中国大陆经济运动的现实表现。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农业民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形成游牧民族，南方民族多为农业民族，北方民族多为游牧民族，这些特点都是由经济形态决定的。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皮披裘与丝麻纺织、食肉饮酪与饭菜杂餐、骑射驰骋与担挑车载，到人的气质上的豪爽奔放与温良恭俭，有哪一点与农牧经济无关呢？遂形成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两种类型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正是由这两种文化陶冶熔铸出来的。从以后的叙述即可看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

史的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没有游牧民族的参与,那是难以想象的。一般说来,体现游牧经济的游牧民族,流动性是其特点;而体现农业经济的农业民族,其特点却是稳定性。流动性带来活跃、开放,在流动中容易接触新事物,容易有新发现,但在流动中亦容易产生波动,大起大落,并容易消失。故游牧民族富于变化、勇于创新、善于传播。但游牧民族创造的一切甚至游牧民族本身,都往往是昙花一现。稳定性为保存和积累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为手工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稳定亦容易陷于保守和停滞,故农业民族富于积聚精神,善于接受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尤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中心之后更加如此,但农业民族也容易带有保守性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当此时,又常常需要游牧民族来打破,表现为游牧民族内迁和激烈的民族斗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心地区的高度发展波及四周的宏伟场面,又有各民族向心运动凝聚为新能源的壮观景象,实际上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经济一体化、围绕着一个中心对立统一运动的具体

表现。所以无论对立表现得如何誓不两立，甚至出现暂时分裂，都无非是走向更大统一的具体步骤而已。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游牧民族不能离开农业民族单独存在，更不能摆脱中心任意行动；同样，农业民族离开游牧民族，也会失去应有的活力。在中国大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是相辅相成的。

四 共同祖先

现在常说中华民族是“黄炎子孙”，特别是海外同胞，“黄炎子孙”已成为激发民族感情的口头禅，这是怎么回事？

“黄炎”即黄帝和炎帝，他们都是黄河流域杰出的部落酋长。据传黄帝有熊氏，生于寿丘（今甘肃天水市），曾在轩辕居住，故又称轩辕氏，因成长于姬水（渭水支流），是以姓姬。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显然是以牛为其氏族的图腾标志，因成长于姜水（渭水支流），故姓姜。又传神农氏本起烈山氏，发明农具耒耜后，“始教天下种谷”，所以被尊奉为农皇。神农氏发展集市贸易，约定“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并先于黄帝东迁，定居于陈（河南淮阳），继承伏羲氏的文化遗产，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又亲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从而发明了中草药。黄帝相继东迁，曾与先期到达中原地区的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河北省怀来县），黄帝取得胜利后，又与炎帝结成部落联盟，共同对抗

正在向中原地区进展的三苗、九黎、东夷诸部落，经过大小“五十二战”，最后与蚩尤会战于涿鹿之野（亦在河北省，具体地点说法不一），打败蚩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遂统一了中原地区，为中原地区各部落公认为当然的领袖，使中原地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全面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黄帝采取的措施：第一，建立各种制度。例如：“以师兵为营卫”，建立起军事制度，称云师，“官名皆以云命”，“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建立起职官制度，“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建立起政治制度。第二，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据说黄帝继神农之后，把农作物扩大为黍、稷、菽、麦、稻五种；发明宫室，改变了穴居野处的状况；黄帝正妃嫫祖发明“蚕桑”，以丝织品制作衣服。第三，发展文化。黄帝分别命仓颉造文字、大桡作干支、伶伦定乐律、岐伯“尝味百药，主典医病”，遂开中国文化之源。第四，发展交通。水陆并重，既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同时又“服牛剩马，引重致远”，加强与各地区

的联系。由此可见,在黄帝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发展为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了。

有关黄帝的传说还包括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血缘亲属网。据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正妃嫫祖生玄囂(青阳)、昌意二子。先秦时代,凡中原地区的帝王,都出于二子之后。帝颡顼,为昌意子,即黄帝孙,又称高阳氏(高阳为今河南杞县),都帝邱(河南濮阳),死葬鲋鱼之山,或称务隅之山(河南清丰县);帝喾,又称高辛氏,为玄囂之孙,即黄帝曾孙,都西亳(河南偃师县),死葬秋山之阴(河南清丰县);帝尧,又称陶唐氏,帝喾子,名放勋,初居陶(山东定陶,或谓河北唐望县),曾封唐(今山西省,或谓太原,或谓临汾,或谓安邑),都平阳(山西临汾);帝舜,号有虞氏,为颡顼七世孙;夏禹,为颡顼之孙,或谓距黄帝五世,或谓距黄帝三十世,原居阳城(河南省登封县),都阳翟(河南禹县),禹子启建立夏朝;商的始祖契,为帝喾妃简狄生;周的始祖弃(后稷),为帝喾妃姜嫄生。可见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秦以后的统治者也都

奉黄帝为正宗，并千方百计地与黄帝发生瓜葛。秦把自己的祖系推至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吞燕卵生子大业，鲜卑族建立的拓拔魏（北魏）也把自己的祖系推至受封于北上、因大鲜卑为号的昌意少子，如此等等，均以黄帝子孙为荣。至于分布在各地区的其它族群系统，也都与黄帝发生血缘关系，为黄帝的后代子孙。正如《魏书·序记》所述：“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如东夷系统的少昊，继太昊之后发展为东夷系统各族群，为黄帝次妃女节所生子；南方长江流域的荆蛮系统，出自祝融（重黎），为帝颛顼之后；百越系统出自禹之苗裔；西方的氐羌系统直至西南夷，与黄帝的关系更为密切，黄帝炎帝均出自其中。黄帝子昌意又从黄河流域降居若水（雅砻江），娶蜀山氏女，生帝颛顼。大禹亦生于石纽，为汶山郡广柔人（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今彝语犹称黑为若，若水即黑水，雅砻江（诺矣江）、金沙江（泸水）、澜沧江（兰津）、怒江均含黑水之意；北方戎狄系统出自夏后氏之苗裔，一说淳维（或谓夏桀子）在殷商时逃奔北野，一说夏桀子獯鬻于夏

亡后逃避北野，由獯鬻、玃狁、戎狄发展为匈奴。或谓昌意少子受封于北土，其后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松花江）之北，为当地居民尊奉为田祖，遂为东北各族之源。

从以上不难看出，有关炎帝、黄帝以及“炎黄子孙”的说法纯系神话传说，本来与“盘古开天地”、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等等神话传说联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神话传说系统，像历史折光镜一样折射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各个重要发展历程。西汉司马迁独取黄帝的神话传说加以综合概括和集中提高，作为撰写《史记》的开端，那是经过谨慎选择并寓有深意的。不过，着眼于统一很可能是其深刻寓意之一。据说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各部落，奠定了华夏族的发展基础。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再扩大一步，把黄帝的传说还原为各民族、各部落间的亲密关系，还原为各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还原为中国大陆各地区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整体，那是多么惟妙惟肖啊！须知上古盛行

祖先崇拜，血缘亲属关系又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关系，无怪乎当时要通过人格化和血缘亲属关系来编织各种神话传说了。何况黄帝的神话传说又通过《史记》被纳入正史，实际上也成了二十五史的开端。这或许就是黄帝逐步演化为共同祖先的缘由吧。

其实，对中华民族起源的现代科学研究，早已脱离神话传说的依据，并且也不局限于历史学的范畴。其中民族学立足于现代各民族，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研究，目前已发展到民族体质、民族血液成份、民族群体遗传学等等专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土著民族，带有蒙古利亚人种的共同特征。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互相印证，中华民族确乎来源于共同祖先，并可一直追溯到人猿之际，仅举以下铁凿事实就足以证明：

第一，中国大陆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在云南省的开远县和禄丰县发现了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新近又在元谋地区发现了“蝴蝶腊玛古猿”新种化石和“东方人”牙齿化石。开

远森林古猿在追溯人类起源中居于重要环节。特别是禄丰古猿，有分属于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头骨化石，是从猿向人过渡的中间环节，大约距今 1000 万年至 800 万年之间。“蝴蝶腊玛古猿”新种距今 300—400 万年，已接近于早期直立人。“东方人”已属于早期直立人，距今 200 万年至 250 万年。这些发现足以构成从猿到人的进化序列，雄辩地说明我国云南属于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

第二，我国发现的猿人、古人和新人化石是一脉相承的。还在猿人时代即已显示出独特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以北京人为例。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与爪哇人相似，故属于直立人阶段，但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在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都大同小异，及至旧石器晚期的新人化石，虽出现了南北异形的现象，但都属蒙古利亚人种。南方以柳江人为例，柳江人颜面上部、鼻梁、嘴部的突出程度，硬腭中等大小，上门齿呈铲

形,超过 40 岁第三臼齿未长出等特征表明其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而鼻孔宽阔、身体较矮小等,又说明正在变异为南亚型。北方以山顶洞人为例,山顶洞人所有头骨的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接近于现代的或化石的蒙古利亚人种,从形态方面观察,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并且较直、有下颌圆枕等,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不过鼻骨较窄、身体较高(男性 1.74 米,女性 1.59 米)等特点又说明正在向蒙古利亚人种的东亚类型发展。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体特征,与上述旧石器晚期的智人间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基本上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范围内的联系,只是由南北变异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大体说来,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利亚人种的东亚(远东)类型,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此外,中国东南部还出现头骨变形、拔牙、颌骨异常等与风俗习惯有关的人工畸形现象。总之,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人种成分构成基本上是在同西

方高加索人种相对隔离状况下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直延续至今。如铲形门齿的出现率,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高达96.2%,我国各地发现的人类化石也基本如此。而白种人仅为8.4%,黑种人也只有11.2%,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第三,表现在文化特征上的共同性,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十分明显,华北地区在旧石器早期的中后阶段所形成的两个系统在中国大陆其它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都分别反映出来。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两个系统:一是以大型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匭河——丁村系”,用砾石加工的石器较多,碰砧法在打片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用交互方法打制的石器也占一定的比例,石器基本类型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手斧、石球和刮削器等;一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砸击法在打片中使用普遍,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石器以单面打击为主,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等。各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颇多相似之处,如代表东北地区早期文化的金牛山文化和

庙后山遗址,其中石片石器的种类与加工技术都同于周口店第一地点,连用火、管火亦相同。中国最北部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属东北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其所出土的石器类型和工艺也都与华北地区的下川文化和虎头梁的同类石器很相似。在南方,分布在秦岭南坡、汉水流域和广西百色盆地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多具有华北大型石器的风格;而分布在四川的富林文化,又颇富华北小型石器的特色;特别是在西藏霍霍西里、定日、申札三个地点发现的打制石器,无论在制法上,还是在器形上,都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遗物相似。新石器时代以后,各地遗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共同点也愈来愈多。共同的文化特征,正说明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不然,虽地域毗连,也会显示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中国大陆与西亚相连,在新石器时代同为农业起源中心,但中国大陆的农作物品种以自己培植的土著农作物粟、稻为主,而西亚却以小麦、大麦为主;中国大陆的农具以耒耜为农耕工具,以石刀、镰为收割工具,而西亚却以镶嵌细石刃的

镰刀为收割工具，农具形制也不同；中国大陆的家畜以猪、狗为主，而西亚的家畜却以山羊为主。说明中国大陆与西亚是隔离状态下各自独立发展的。这从反而证明了中国大陆各地区是具有内在联系共同发展。

五 伟大的变革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的 550 年间，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大动乱、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遂导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转折。

自黄帝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各部落以后，经过尧、舜、禹的“禅让”时期，夏启第一次建立国家，夏朝便成为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其后殷商（约当公元前 16 世纪—前 11 世纪）、西周（约当公元前 11 世纪—前 771 年）相继因循，至西周已发展至完备形态。西周的疆域，东起海滨，西到陕甘，南至江南，北迄辽宁。西周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世袭制、井田制、礼制和法制。故在西周的疆域内封国林立，等级森严。其实西周的封国无非是部落居住点的扩大，所谓分封也无非是派

遣亲信进行直接统治而已。周王亲自统治的关中地区,称为宗周,号称天子之国,也不过方圆千里,其它封国更等而下之,通常为方圆百里。国与国之间还间隔着辽阔的空旷荒野,如郑与宋号称邻国,两国之间就有一大片分别被称为弥作、顷丘、玉畅、岩、戈、锡的无人区。即便区区封国之内,也有国野之分,贵族和自由民住在城防以内,称国人,在城外的劳动者称野人,其处境也确实地广人稀的荒野。分封最早的齐国,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发展,至春秋初年,四郊尚且是“负海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而地处中原建国较晚的郑国,城郊竟然是满地蓬蒿藜藿的荒凉景象。其它至今可考的 140 多个封国均可依此类推了。西周直接统治的诸封国称华夏,以外则分别称蛮夷戎狄。

西周末年,游牧于西北的诸戎率先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动,西周的中心统治区关中平原便首当其冲。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遂取西周的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而居泾渭之间,足迹东至今陕西大荔和河南灵宝,迫使周平王东迁洛邑(河南洛阳)。所以至春秋时期,自陇以西

有绵诸、緄戎、翟貌之戎；岐山、梁山与泾水、漆水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晋南地区有骊戎、允姓之戎；伊川有陆浑之戎；洛阳附近的伊水与洛水间有杨拒、泉皋、伊洛之戎；今山西平陆有茅戎等等，诸戎名号不一，没有统一的组织，各自穿插于华夏诸国间参错杂居。与此同时，游牧于北方的诸狄经过初步联合后也开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移动，成为春秋时期华夏诸国的劲敌，曾迫使邢（河北邢台市）东南迁夷仪（山东聊城西南），迫卫（河南淇县）迁楚丘（河南滑县）后再迁帝丘（河南濮阳西南），灭温（河南孟县东），驰骋于晋、冀、鲁、豫边区，多次进攻齐、晋、郑、鲁诸国。及至分裂为赤狄、白狄之后，其进攻性才大为减弱，并逐渐走向定居。赤狄有六部：东山皋落氏（山西垣曲）、廛咎如（山西平顺东南）、潞氏（山西潞城东北）、甲氏（河北鸡泽北）、留吁（山西屯留南）、铎辰（山西长治）。白狄有三部：鲜虞（河北正定东北）、肥（河北藁城西南）、鼓（河北晋县西）。另有一部白狄居河西（陕北延安附近）。除此以外，当时在晋北有北戎（分布在今山西代县、繁峙、大

同以及河北易县、宣化一带)、林胡(内蒙古东胜县)、楼烦(山西岚县及其以北)、无终(初在今山西太原东,后徙今河北玉田接薊县境)。燕北有东胡、山戎等。以上属戎狄系统。

《公羊传》形容春秋初期的形势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中国指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当时处在南夷与北狄的夹击下,已经岌岌可危了。不过,这里所说的北狄,主要指北狄中的赤狄潞氏。它役使众狄,并控制西起晋之蒲(山西隰县北)、屈(山西吉县北),东界齐鲁卫绵延逾千里的广大地区,对华夏诸国确实是严重的威胁。而南夷则主要指楚国。荆楚原是苗蛮系统中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商朝时曾受到高宗武丁的进攻,后又追随武王伐纣,故西周成王封其首领熊绎为子爵,居丹阳(湖北省秭归)。熊绎子孙不断扩大领土,征服邻近的其它苗蛮部落,立国号楚。春秋初愈益强大,迁都郢(湖北省江陵),北向中原,进攻随(湖北随县)、邓(河南邓县)、申(河南南阳市北)、蔡(河南上蔡西南)等国,成为华夏诸国来自南方的劲敌。在楚的后方,有居

今湖北的卢戎、群蛮、百濮；有居今湘黔的南蛮；有居今粤桂的南越；有居今福建的闽越；有居今浙江的瓯越；有居今广西南部的骆越；有居今四川的巴、蜀；有居今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今贵州省西部、北部及云南、四川相邻地区）、滇（云南滇池地区）、邛都（四川东南部）最大，它们大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至于后起争霸中原的吴国（今江苏无锡一带）和越国（江苏南部和浙江），完全是晋国和楚国扶植起来的，是晋楚争霸的产物。

由此可见，正是戎狄的内迁导致西周的灭亡，并打乱了西周所建立的正常统治秩序，揭开了春秋战国时代大动乱、大分化、大变革的序幕，故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混战带有民族战争的浓厚色彩。最先奋起称霸的齐桓公，正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行变革兼并之实，即在国内进行革新的同时，连续吞并了东夷系统中的郕（山东省郳城县）、莱（山东掖县、黄县一带）、介（山东胶县与诸城之间）、牟（山东莱芜县）、夷（山东即墨西）等十多个邻国，扩大了国土，增强了实力。其后相继称霸的晋、楚、秦等国，

也都是通过兼并戎狄蛮夷而强大起来的。楚统一江汉地区的蛮夷后，又兼并淮夷（淮河流域）诸国，还吞并部分华夏小国与诸戎，先后兼并四十五国，自称蛮夷之邦，最为大国。晋在所谓“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的状况下，剪除“公族”势力，巩固内部，当灭掉耿（山西河津南）、霍（山西霍县西）、魏（山西芮城东北）、虞（山西平陆东北）、虢（河南三门峡市）等小国后，即把进攻矛头指向戎狄，先用“攘夷”以达到“启土”的企图，后用“和戎”以达到“启土”的目的，先后兼并了骊戎、赤狄诸部，统一山西大部，把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在晋军中有“狄卒”，是晋军与楚争锋的重要力量。至于秦国的发展壮大，始终与戎狄联系在一起。秦的祖先曾长期生活于戎狄之间，故在商周以善养马和驾馭而著称。西周灭亡时，秦襄公由于救周和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分封为诸侯，赐于岐山以西为诸戎占领的土地。从此，秦就在兼并诸戎中不断壮大，正当晋楚争霸中原的时候，秦却西向戎王发动突然袭击，大获全胜，“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终于统一关陇地区诸戎，

以致秦国被看作戎狄之邦，可见戎狄构成了秦国的主体。及至战国，秦又进军巴蜀，并征服居于湟水流域的姜戎，跃居头等强国。山东诸国也把继续兼并戎狄，学习骑射当作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国初年，魏国之所以首先强大起来，就与任用李悝、人习骑射以及征服鲜虞建立的中山国为属国有关。最为明显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攻灭中山国和北戎建立的代国，降服林胡，一时变得强大无比。燕将秦开在破走东胡，东胡退却 2000 余里之后，使燕跃居七强之一。于是秦、赵、燕三国各在其北境修筑长城，而退居长城一线之外的戎狄，与居于原地的戎狄部落混为一体，又以胡和匈奴的名字出现，揭开了秦汉时期民族斗争的序幕。在南方，楚继续南向蛮越地区发展，派遣庄豪经沅水伐夜郎，战于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一举灭夜郎；派遣庄蹻以武力征服滇国。开秦汉时期经营百越和西南夷地区的先声。

综上所述，自西周末年以来，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至战国末年，许多内迁民族都已销声

匿迹，甚至连名称也不见于历史记载了。可见已与华夏融为一体，相互差别已全部消失，以致彼此不分了。像这样以民族矛盾开始，最后以民族大融合告一段落，并呈现为如此波澜壮阔的宏伟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是带有历史开创性的伟大创举，为中原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虽然华夏名称依旧，但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表面看来，长达五百余年的战乱，确乎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实质上包含在其中的却是前无古人的社会革命和历史变革。中国社会历史在分娩阵痛中获得了新生，从而在春秋战国以后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进步都是与民族大融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牛耕和铁器作为春秋战国时代获得新生产力的两大重要标志，正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不言而喻，戎狄是游牧民族，培育优良品种牲畜和使用畜力自然是戎狄的重大贡献，春秋时戎狄与华夏杂居，才把使用畜力与华夏的先进农耕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发明了牛耕。于是牛便由用作祭祀的“宗庙之

牺”，转变为进行农耕的“畎亩之勤”了。至于用铁，也与夷狄有关，按《说文解字》：“钺，古文铁，从夷”。形意为夷所拥有的黑金，即不同于美金青铜的恶金。铁的文献记载也最先见于齐晋。齐桓公伐山戎之后，管仲才建议齐桓公用恶金制造农具；齐“叔夷钟”铭文记载，齐灭莱夷后，一次就赐予叔夷“造戣徒四千”，足见莱夷铁业之发达。晋国为戎狄集中分布区，公元前531年晋铸刑鼎所用铁，全部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取的，足见包括戎狄在内的民间已使用中原的高超冶炼技术来冶铸铁才使铁器广为应用了。在传说中，吴越更以冶铸铁剑名扬天下。现在于河南省洛阳、信阳、三门峡以及湖南长沙、河北邯郸、江苏六合等地发掘出土的春秋铁器证实了上述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牛耕和铁器导致小农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又进而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其所引起的全而社会变化，由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集中体现出来。而变法首先从魏国开始，最先在三晋地区显示出效果，最后于秦国彻底完成。这并非无故，正说明

戎狄在这里彻底摧垮了西周的旧制度，然后又经由民族大融合的途径，在共同创造新生产力的基础上创造着新社会制度。其实这种自上而下的变法无非是把正在成长中的新制度加以集中提高后再大力推行而已，故能收到水到渠成的功绩。不然，何以同样的变法推行于其它地区，其收效就不如此显著呢。

其次，民族大融合之花，直接结成高度物质文明之果，通过广大地区迅速得以开发表现出来。举例来说，晋南地区原为“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荒野，自允姓之戎迁居后，“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被辟为发达的农业区。齐国一跃成为“膏壤千里宜桑麻”的地区，与春秋初年形成鲜明的对照。秦关中平原自郑国渠竣工后，“为沃野，无凶年”。秦蜀守李冰筑都江堰，致使蜀地“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这都是各民族携手开发的。生产的发展，更促进了商品交换，各地的交往中心，相继兴起为手工业和商业集聚的城市，如周的洛阳、魏的大梁（河南开封）、韩的阳翟（河南禹县）、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山东定陶）、卫的濮

阳、秦的咸阳、楚的郢（湖北江陵）、燕的蓟（北京），都是当时繁华的著名城市。这些城市再不是过去的孤立据点，而是小农汪洋大海中所涌现出的万户之邑，充分显示出战国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繁荣兴盛景象。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这种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最后，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到当时少数民族在创造精神文明、发展科学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少数民族是春秋战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中的生力军，在推动“百家争鸣”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现有材料看，正是戎狄打破了贵族对科学文化的垄断，正是戎狄突破了思想禁锢、解放了思想。对于西周统治阶级，戎狄是胜利者，当然不会理睬什么“学政在官”、“工商食官”那一套，把以前只有贵族才掌握的科学文化接受过来自由运用了。如允姓之戎的首领驹支，面对晋大臣范宣子的指责，即景生情，“赋《青蝇》而退”，《青蝇》是《诗·小雅》中的一篇，主题在于责备周幽王不该听信谗言。戎子驹支竟然能够针锋相对地选择《青蝇》一诗，作为对付敌手的武器，随口诵

出,可见其对华夏文化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了。至于戎狄在解放思想中的启蒙作用,从由余与秦穆公的一段对话中即可看出。由余为戎王出使秦国,秦穆公对他说:我们华夏各国,建立在诗书礼义道德和法制的基础上,历史上还经常发生动乱,现在戎族根本就没有这一套,要进行治理,那恐怕就更困难了吧!由余听后哈哈大笑说:你说的这些治理手段,正是发生动乱的原因。你们华夏的头等圣人黄帝,开始以礼乐法度进行统治,并以身作则,才算达到一个小小治理的局面。后来的当政者越来越骄傲、荒淫和奢侈腐化,还一个劲地用法制去欺压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而老百姓又反过来用仁义道德去指斥统治者的胡作非为。上下对抗到极点,便发生动乱,互相残杀,很多宗族被消灭,像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我们戎族却不然,内部没有利害冲突,大家平等相待,酋长由选举产生,故能以淳厚的道德对待下人,下人也能忠诚事业,上下交融,以致一个部落团结得如同一人,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啊!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哑口无

言。这段对话实际上已开创了诸子百家的先河。可见戎狄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没有框框的限制，对华夏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所以也就容易推陈出新。因此，可以肯定，少数民族人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最活跃的因素，据说著名的《穆天子传》就是鲜虞人撰述的。《韩诗外传》说中山之君好诗，特别喜好《黍离》与《晨风》。《韩非子》也说中山国“上尊学者，下士居朝”。于此足见戎狄对文化之重视、对学者之尊崇，事实上凡属奇异之士，即便是“岩穴之士”、“穷闾隘巷之士”、“布衣之士”、“异族之士”，在中山国都同样受到礼遇和重用，如司马喜、李克、乐池、乐毅之子等都曾充任过中山国的臣、相和食客，这就是明证。以上事实说明，没有戎狄内迁，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春秋战国就不会获得勃勃生机的大发展，更不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六 秦汉大统一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东起海滨,西至甘青,北抵河套、阴山、辽东,南迄岭南的辽阔疆域内,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自称始皇帝,以树立绝对的皇权。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以后递增至四十余郡。在全国范围内,“使黔首自实田”,确立小农男耕女织的个体经济,以便达到“上农除末”(强本抑末)的目的。然后通过编户齐民确定“五家为伍,二伍为什,十什一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基层组织系统。同时统一法律、统一征兵赋税徭役制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统一历法。并修治直道、驰道以加强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又采取“焚书坑儒”以加强思想统治。从而使全国构成一个具有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全面奠定了尔后两千余年继

续发展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汉族的形成。特别是在西南夷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开“五尺道”;统一岭南地区,开凿“灵渠”,移民50万与越人杂处;北逐匈奴,修万里长城等等,更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向划时代的新阶段。

两汉相继,沿着秦始皇开辟的道路,完成了秦始皇未竟的事业。不但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的版图,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雏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秦汉文化。在这里,匈奴统一北方是实现全国空前大统一的前奏,全过程围绕着汉与匈奴的斗争而展开。

正当秦楚战乱之际,匈奴冒顿(mò dú 莫读)单(chán 蝉)于凭借“鸣镝”(射出后带鸣声的箭)指挥的强大骑兵,采用闪电式的奔袭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破月支(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东灭东胡(蒙古高原东部),挣脱左右挟持的被动局面,又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部夺回秦所攻占的土地(河套、伊克昭盟),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等国(今西伯利亚南部)。在

迫使西汉“和亲”后，挥戈西向，摆开千里战场，使“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完成了从东北到西域横跨蒙古高原的统一，“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第一次把北方游牧民族合并为“百蛮大国”，并分中、左、右三部进行统治。中部由单于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左部居东方，与汉上郡以东地区相对，以左屠耆王（左贤王）为首；右部居西方，与汉上郡以西地区相对，以右屠耆王（右贤王）为首。集军事、政治、社会组织于一体，充分显示出“行国”的特征，带有军事奴隶主政权的性质。与西汉政权形成鲜明的对照。二者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汉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但为达到战争的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汉从匈奴手中夺取河套、河西走廊等地区后，分别设朔方郡和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并进而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向边郡及新占领区大量徙民和派遣戍卒，采取民屯和军屯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使这些一向荒凉的地方变成了先

进的农业区。汉出自对匈奴战争的需要，对北方旧有长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与扩建，在今包头、呼和浩特的长城沿线增设了内城、外城的城堡。为了屏蔽河西走廊，新修了从令居西至敦煌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淖尔）也修建了亭燧。整个北方和西北沿边，不但具有完善的边塞烽燧系统，而且设置的邮亭驿站也相望于道。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边郡与内地的联系，促进边郡由荒凉走向繁荣，以致出现了“牛马布野”的景象，从而更扩大了农牧业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本来是西汉的政治军事据点、实际上反而成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站。“牛马衔尾入塞”，足见交换规模之大。

当然，长期战争对汉和匈奴双方都发生了直接影响。汉在加强中央集权制中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小农大量破产引起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匈奴则由于在战争中失败而一蹶不振，进而导致内部分裂，西汉后期出现了呼韩邪单于和致支单于对立的局面，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与汉帝结为兄弟，并要求

重新和亲。公元前 33 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下嫁呼韩邪单于，从此恢复了中断百年的汉匈和亲。致支单于孤立西逃，在西域被击杀。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服东汉，北匈奴在东汉的连续征战下西迁，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

为断匈奴之右臂，西汉派张骞通西域，东汉又派班超通西域。西域的狭义概念，主要指我国今天的新疆地区。当时有 36 国，西汉末年分裂为 55 国，集中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边缘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河以南，昆仑山北麓，由东向西分布着楼兰（鄯善）、且末、婼羌、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于阗、皮山、乌托、西夜、蒲犁、莎车、依耐、无雷、难兜等 17 国，称南道诸国；塔里木河以北，天山南麓，自东至西分布着山国、危须、尉犁、焉耆、渠犂、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 11 国，称北道诸国；天山以北与阿尔泰山以南的准噶尔盆地，自东至西分布着蒲类（新疆巴里坤）、蒲类后国、车师后城长国、车师后国、车师前国、车师都尉、郁立师、卑陆、卑陆后国、狐胡、单桓、东且

弥(新疆乌鲁木齐市)、西且弥、乌贪訾离、劫国、乌孙(乌鲁木齐市以西至今苏联境内,其都城赤谷即今苏联伊什提克)、大宛(都贵山城,即今苏联卡散赛)、休循、捐毒等 19 国。若按经济类型划分,属于游牧经济类型的如乌孙等十余国,大部分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属于农业经济的如于阗、莎车、疏勒、龟兹、焉耆等十余国,大部分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其余则属于半农半牧经济。

这些地区民族成份复杂,现在分析,新疆南部,特别是昆仑山区,大约属氐羌系统;大宛等可能属于阿拉伯系统;休循等属于塞种。这些国家曾先后被匈奴征服,匈奴设僮仆都尉进行管辖。汉与乌孙和亲,先后遣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下嫁乌孙王,联合抗击匈奴,在汉匈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公元前 60 年,汉在西域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诸国,取代了匈奴的僮仆都尉。并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犂(新疆库尔勒、尉犁间)屯田,设使者校尉管理,供应来往信使,以免增加西域诸国负担。汉元帝设戊己校尉,驻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管理屯田,属西域

都护管辖。西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祖国版图,从此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本地的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构成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北民族的完整概念,其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最初目的。在政治上,西域诸国的上层人物主动接受汉朝的“册封”,成为西汉政府的地方官员,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佩汉印绶”的官员“凡三百七十七人”。在经济上,内地的丝织品以及蚕桑、纺织技术、冶铁技术、井渠法、农耕技术、土特产如邛竹杖、桃、李、黄连、土茯苓等等传入西域;西域的土特产毛织毡毯、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绿豆等)、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西瓜)、胡葱(大葱)、胡椒、胡萝卜、苜蓿(红花草)、葡萄、石榴、骆驼、驴、汗血马等传入内地。这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文化上,内地的饮食、衣着、建筑、文字、乐舞等传入西域,西域诸族爱慕中原文明,纷纷东来汉都(长安、洛阳)学习汉文化;西域文化如摩诃、兜勒(乐曲)、胡戏、胡舞、琵琶、箜篌、茄笛、横吹、胡服、胡床等也传入内地,为文化发展

注入了新血液，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由西域沟通了中亚、西亚直至欧洲的商路，促进了东西交流，内地的丝织品正是通过这条通路传向西方，远达罗马，所以这条通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又被称为“丝国”。佛教也是经由这条通路传入内地的，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断匈奴之左臂，汉早已注意到东北与朝鲜地区。东北地区与内地关系密切，两汉时，肃慎改称挹娄，分布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东部、苏联滨海边区全部及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南部一带，臣属夫余；夫余分布于松花江流域；挹娄、夫余以南直至朝鲜半岛，分布有高句骊、沃沮、秽貉等。公元前109年，汉从山东半岛和辽东水陆两路出兵，灭卫氏朝鲜，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将临屯、真番合并于乐浪、玄菟两郡。乐浪郡郡治今平壤，辖境在朝鲜半岛北部，玄菟郡辖境由今朝鲜咸境道，两江道直至辽宁省东部接吉林地区（新宾、铁岭、通化一带），夫余受玄菟郡统辖。上述地区均以农业为主，在东北发展水平较高，故能设

郡直接统治。这样，乐浪、玄菟便与辽东、辽西二郡连成一体，稳定了东北平原的局势。在今内蒙古与东北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本为东胡，匈奴破东胡之后，余众散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和鲜卑民族。乌桓居南部，靠近汉区，鲜卑居北部，它们同为游牧民族。西汉初年，乌桓又为匈奴打败，臣服匈奴。汉武帝时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曾徙部分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侦察匈奴的动静。故在东汉乌桓逐渐南移于幽州与并州部分郡县；鲜卑当北匈奴西迁后，逐步据有匈奴故地。东汉曾在上谷宁城（河北宣化附近）复置护乌桓校尉，兼管乌桓、鲜卑事务；同时亦常常招服乌桓与鲜卑的渠帅大人，封为王侯，以便利用他们制服匈奴。东汉末年，乌桓王蹋顿曾雄据北方，鲜卑部落大人檀石槐亦曾一度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了横贯东北与西域的大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此后，高句骊逐渐强大。

西南云贵川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生活习俗不同的部落，分别属于百越、百濮和氐羌三个系统，秦汉统称西南夷。汉武帝派

唐蒙和司马相如到西南夷地区进行活动，在夔(bó 伯)族地区设犍为郡(郡治今四川宜宾)，修夔道，并在邛、笮(zé 则)、冉駹地区置都尉和十余县。张骞在西域见到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来自身毒(印度)。为打通由巴蜀至西域的通道，汉武帝重新振作起经营西南的决心，遂采取兵威与劝诱相结合的办法统一了西南夷地区。于今贵州省及滇东的夜郎、且兰地区设牂(zāng 脏)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于今四川西昌一带的邛都地区设越巂(xī 西)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于今四川雅安一带的，笮都地区设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于今四川茂汶一带的原冉駹居住区设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于今甘肃成县一带的原白马居住区设武都郡(治今甘肃武都县)；于今云南昆明一带的原滇国设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对以上西南夷地区新设郡，采用既从内地派遣太守、县令前往任职的办法，又采取封当地各族首领为王侯以“复长其民”的措施。并免征赋税，分别由内地郡县提供新设郡县的开支，同时鼓励内地的汉族地主前往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东汉

明帝时，居住在澜沧江流域及其以西的哀牢人主动要求内属，于是设永昌郡（今云南保山）来管理今云南保山、德宏、临沧、西双版纳等地区的各民族。汉在西南设郡，促进了西南各族的发展。西汉末年，于朱提（今云南昭通）开凿“龙池”灌溉稻田，滇池地区亦开造稻田 2000 余顷，牛耕也由内地传入，永昌也开始有“蚕桑”，并开始出产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罽毼（jì duó 记夺，毛织品）、帛叠（棉织品）、兰干细布（麻织品或木棉织品）等。文化上也开始摆脱刻木、结绳记事的阶段，东汉时滇池地区兴起学校，牂柯名士盛览（西汉人）、尹珍（东汉人）都在家乡大力兴办学校以改变文化落后面貌，《华阳国志》说昭通地区“民好学，多士人”。由此可见，内地与西南地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了。

秦统一后，即在百越居住地区设会稽（郡治吴县，即今苏州市）、闽中（郡治东冶，即今福州市）和南越桂林（郡治今广西贵县南）、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市）、象郡（郡治今广西南宁市西）。百越早已与中原联为一体，越人无诸和摇因参加秦末农民起义有

功，故汉初封元诸为闽越王，都冶（福建闽侯）；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永嘉）。而秦吏龙川令赵佗（河北真定人）却趁秦楚混乱之际，据南越进行封建割据，汉初予以容忍安抚，汉武帝时，赵佗五世孙南越王赵兴要求内属，其相吕嘉发动叛乱，杀南越王兴及太后，公元前 112 年汉发兵平定南越，于其地置儋耳（郡治今海南儋县）、珠崖（郡治今海南琼山县）、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市）、苍梧（郡治今广西苍梧县）、郁林（郡治今广西贵县）、合浦（郡治今广东合浦县）、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日南（郡治今越南义安）等九郡。促进了南越地区的发展，如东汉时任延为九真太守，以大力推广中原牛耕、铁器等先进农耕技术来改变当地的原始射猎经济，很快便使当地由“每致困乏”转变为“百姓充给”，同时推广中原的个体婚姻家庭制度以改变当地的原始婚姻家庭状态，也收到人口增加的积极效果。早在西汉末年，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大力以中原文化“教导民夷”，早已收到与任延相同的效果。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可见设郡引起了巨大

的变化。

长江中游地区的民族统称为蛮，相互区分则贯以地名，大体集中于两个地区：其一分布于洞庭湖周围及其以西的山岭中，有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同属以犬为图腾的盘瓠之后；另一部分分布在鄂西、川东地区，分南郡蛮和巴郡蛮，皆出自以虎为图腾的廩君之后。巴人呼赋为𡵚（zōng 宗），故称𡵚人；因作战时蒙板楯，故又称板楯蛮。南郡蛮有时也称𡵚人，西汉时分为巫蛮、江夏蛮，后又细分为沮山蛮、黄邮蛮、郢山蛮、五水蛮、沔中蛮等。长江下游的丘陵地区有越人散处，泛称山越。长江流域的民族从来就在郡县的直接治理下，虽饱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但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也较高，最早与中原地区构为一体。

七 南北同步

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度发展带动四周的基础上，这归根结蒂是小农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在破坏着借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豪强地主的恶性发展导致小农的大量破产，为封建割据势力提供了温床，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绿林、赤眉大起义并未扼止土地兼并的趋势，只是起了缓解作用，豪强地主在东汉获得更迅猛的发展，雄据一方的封建地主田庄在全国林立，而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不但没有打破这种局面，却很快被封建割据势力镇压下去，埋下了大分裂、大混战的祸根。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引起民族矛盾尖锐化，居住在陕甘的羌族揭竿而起，东汉发动了三次对羌族的战争，羌族的反抗虽被镇压下去，但却更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公元190年至公元220年，陷于封建军伐混战

割据状态的东汉已名存实亡了。

从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起,至公元 589 年隋统一止,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新时代。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内容不同,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都几乎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同样由北方民族内迁引起的。不过,魏晋时期北方民族的内迁并非像春秋时代那样是填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空白,而是推动黄河流域人口南迁的趋势,结果是使南北都同时发生了民族大融合,长江流域迅速赶上了黄河流域。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民族大融合的实质是各少数民族在完成封建化过程中把封建社会推向了新阶段,从而为隋唐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必须看到,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说来是少数民族起主导作用,特别是鲜卑族,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这是由于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由豪强地主构成,充分表现出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除了镇压人民,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造混战割据之外,再不能对社会历史起推动

作用。纵有个别人物，如曹操、诸葛亮、孙权等在一时起到巨大作用，但毕竟没有回天之力，所以当时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充满生机的少数民族便成了历史的主人，担当起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继续前进的重任。

自东汉中期以来，有两种动向：一是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流，这主要是战乱引起的，东汉发动的三次对羌族的战争以及东汉末年的封建军阀混战，都使人口南流达到高峰，汉族蜂拥至长江流域甚至江南地区；一是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如匈奴和隶属于匈奴、称为“匈奴别部”的羯族南迁至今山西省；氐族从今陕、甘、川交界地区东迁关中平原；羌族也从今青海、甘肃一带东迁关中平原；鲜卑慕容部南迁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鲜卑拓拔部也辗转南迁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所以整个北方边郡从辽西、幽州、并州直至关陇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犬牙交错，以致氐羌居关中人口之半。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一方面通过颁布户调式保障封建地主的特权，另一方面大封同姓王侯和异姓王侯，以满足士族门阀的欲望，终于酿成争权夺利的“八王

之乱”。从公元 291 年至公元 306 年，战乱从都城洛阳扩大到黄河两岸广大地区并一直蔓延到关中，牵动各州郡以及乌桓、鲜卑兵参战，长达 16 年的反复厮杀，使黄河流域生灵涂炭，城乡变为废墟，造成大量流民。据记载：流入汉中、巴蜀的有数万户；流入颍川、汝南、南阳的有数万户；流入荆州（湖北、湖南）的有十数万户。流民“扶老携幼，不绝于路”，估计黄河流域约有一半人口流入长江流域或岭南地区。各地官吏勾结地方豪强地主趁机对流民进行敲诈勒索，西晋政权又下令勒逼流民还乡，流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巴氏人李特首先领导氏族流民起义于绵竹（今四川省绵竹），于是流民起义席卷长江流域；与流民起义相呼应，饱受压迫的内迁各族也纷纷举行起义。公元 304 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于公元 308 年称帝，建立汉，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刘渊之子刘聪继位后，于公元 311 年攻陷洛阳，又派刘曜于公元 316 年攻陷长安，灭亡西晋。

西晋灭亡后，内迁于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国家，从公元 304 年到公元

439 年的 135 年间,匈奴族先后建立了汉(公元 304—318 年,都 平 阳)、前 赵(公 元 318—329 年,都 长 安)、北 凉(公 元 401—439 年,都 张 掖,后 迁 姑 臧,即 今 甘 肃 武 威)、夏(公元 407—431 年,都 统 万,即 今 陕 西 靖 边)等 四 个 政 权。羯 族 建 立 后 赵(公 元 319—350 年,初 都 襄 国,即 今 河 北 邢 台;后 迁 都 邺,即 今 河 北 临 漳)。鲜 卑 族 先 后 建 立 代(公元 310—376 年,都 盛 乐,即 今 内 蒙 古 和 林 格 尔 北)、前 燕(公元 337—370 年,初 都 龙 城,即 今 辽 宁 朝 阳,后 迁 都 邺)、后 燕(公元 384—409 年,都 中 山,即 今 河 北 定 县,后 迁 都 龙 城)、西 燕(公元 385—394 年,都 长 子,即 今 山 西 长 子)、南 燕(公 元 398—410 年,初 都 滑 台,即 今 河 南 滑 县;后 迁 都 广 固,即 今 山 东 益 都)、西 秦(公 元 385—431 年,都 苑 川,即 今 甘 肃 靖 远;后 迁 都 金 城,即 今 甘 肃 省 兰 州 市)、南 凉(公 元 397—414 年,都 金 城;后 迁 都 廉 川 堡,即 今 青 海 乐 都)等 七 个 政 权。氐 族 先 后 建 立 仇 池(占 据 今 甘 肃 东 南 部)、前 秦(公 元 351—394 年,都 长 安)、后 凉(公 元 386—403 年,都 姑 臧)等 三 个 政 权。羌 族 建

立后秦(公元384—417年,都长安)。汉族先后建立前凉(公元301—376年,都姑臧)、冉魏(公元350—352年,都邺)、西凉(公元400—421年,都敦煌,后迁都酒泉)、北燕(公元409—436年,都龙城)等四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混战,引起汉族更大规模的南迁,特别是汉族门阀士族大地主,纷纷携家南逃,估计这时迁往江南的人口约占本地人口的十分之六七;同时,十六国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和劳力,也都贪婪地强迫民户迁往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特别是集中于国都附近。如刘聪就在都城平阳集中了近百万的匈奴、羯、氐、羌、汉人,他设置的左右司隶部共领民户40万户,单于左右辅共领“六夷二十万落”。石勒石虎实行“虚其心腹,以实畿甸”的策略,在攻破长安灭前赵之后,把秦雍二州的大族迁到襄国;石虎在击败石生之后,又迁秦雍二州汉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苻坚灭前燕,迁鲜卑诸王及“关东诸豪杰及诸杂夷十余万户”于关中,又把关中的15万户氐族派驻关东各地。如此等等,对黄河流域盘根错节的豪强大地主无疑是

一次毁灭性的大铲除,更加速了民族大融合。

公元 317 年,司马睿又在建康(江苏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统治地区大致包括淮河、汉水以南,即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全部以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省的一部分。当时北方汉人大量迁入本地区,被称为“侨人”或“北人”。在侨人较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起侨州、侨郡和侨县。仅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就设有两个侨州、33 个侨郡和 77 个侨县,侨人最多的侨立南徐州,侨人约占全州总人口的 52%。侨人在南方扩散,与当地各族人民杂居,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密度,有人估计至刘宋时编入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公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战,保持了南方和平稳定的局面。公元 399—411 年的孙恩、卢循农民起义,扫荡了门阀士族大地主的势力。为加速南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据文献记载,直到西晋末年,江南地区还没有摆

脱“火耕而水耨”的落后状态。经过东晋南北朝二百多年的发展,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呈现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美好画面。建康、京口、广陵、山阴、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繁华都市相继兴起,使江南地区一跃成为先进的繁荣富庶之乡,从此根本扭转了南方落后于北方的局面。

随着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江南的少数民族大部分改变了面貌,步入民族大融合的轨道。居住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山越族,从此不再见于记载,可见民族差别已经消失,完全与汉族融合为一体了;散居在今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的蛮族和居住在湖南、广东的俚族,也都在改变生产方式,或快或慢地开始封建化过程,其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也与汉族融合为一体了;而居住在今四川、湖北西部、广西、贵州的僚族,大部分都有所发展,特别是与汉族杂居的僚族,发展迅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相反,居住在山区的僚族,发展迟缓,散居川黔山谷间的僚人,甚至依然处于原始社会的落后分散状态。南方民族大融合的

特点,既有如上所述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现象,又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现象。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在云南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即所谓汉族夷化,迁往云南的汉族大姓学习“夷经”,平常言论也多引用“夷经”。如南中大姓爨(cuàn 窜)氏,在南朝时已发展融合为“爨蛮”,势力最大,曾利用南北朝的矛盾,把势力扩大到云贵地区,后来分为东、西爨。东爨居今贵州贞丰一带,居民以乌蛮为主,故称“东爨乌蛮”;西爨在今云南曲靖地区,居民多是汉族屯民与叟人的融合体,以“白蛮”为主,故称“西爨白蛮”。可见汉族的夷化,对西南各民族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北方各民族的活动,始终以鲜卑族为主体。鲜卑族分宇文氏、慕容氏、拓拔氏。慕容氏发展水平较高,进入中原地区后,很快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与汉族融合为一体。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于公元4世纪西迁,公元5世纪初据有今青海地区,与氐、羌族杂居,是鲜卑族伸向黄河上游的一支,把蒙古高原的优良畜牧品种和先进的畜牧技术带到了青藏高原,大大促进了青

藏高原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民族的形成。拓拔氏在鲜卑三部中最为落后,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阶段,从事游牧业,迁入呼伦贝尔草原后,前进步伐加快,后来在不断南迁中不断发展壮大,十六国时期曾建立代国,但很快为前秦消灭。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给拓拔部带来了重新复国的机会,公元 386 年拓拔珪重建魏国,灭后燕后定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公元 439 年拓拔焘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与南朝相对峙,史称北魏或拓拔魏。北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北魏的统一北方,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

在北方,活动于蒙古高原大漠南北的民族主要有柔然、敕勒及后起的突厥。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始属鲜卑,后来强大,在征服高车诸部之后,雄据大漠以北,与北朝时而进行战争,时而和亲,在长期接触中,柔然中相当大一部分与北朝境内各民族融合。高车以多乘高轮车而得名,同时还有丁零、敕勒、铁勒等许多不同的名称,可能出自对其中诸部落的不同称呼。大体说来,居于漠南至中原的一支称丁零,居于

漠北的称高车或敕勒,均曾遭受过北朝或柔然的统治。公元487年,高车十多万帐落集体西迁,经过阿尔泰山到达吐鲁番盆地,建立高车国,对西域的民族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突厥起源于准噶尔盆地以北,游牧于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迁至今新疆博格多山,被柔然征服后,以锻铁奴身份被迫迁居今阿尔泰山。公元6世纪初,摆脱柔然的统治,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公元552年,突厥杰出首领阿史那率众大破柔然汗国,在漠北建立突厥汗国。

东北地区,高句骊乘南北对峙之机,占据辽东、玄菟、乐浪、代方四郡,雄据东北平原东南部;勿吉为挹娄之后,分布于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契丹、库美奚皆源于东胡,游牧于松漠之地,即今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中上游地区,契丹居东,库美奚居西;室韦(失韦)分布于嫩江和黑龙江上游;地豆于游牧于今内蒙古东西乌珠穆沁旗及其以南地区;乌洛侯游牧于今呼伦贝尔草原。这些民族都通过朝贡互市与北朝相联系。西方的氐羌大部分在北魏的直接统治下,吐谷浑臣属北魏。西域本为柔

然控制,后来出现了高车与柔然的对抗,但由于“丝绸之路”始终畅通,故西域各族始终与中原关系密切。

由此可见,北魏继续保持着中原地区的中心作用,这表明北魏的经济已逐步恢复和发展,拓拔鲜卑正是在转向促进农业生产中完成封建化过程,逐渐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其标志是魏孝文帝的改革。公元471年魏孝文帝拓拔宏即位以后,通过实行均田制、三长制、迁都洛阳以及各种汉化措施的改革,使北魏成为真正统一的整体,重新把大批农民从门阀士族大地主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成属于国家编户的自耕农。这便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恢复了小农的统治地位,然后再用三长制把小农组织起来,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相比,可以说是同工异曲,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

其后宇文鲜卑建立的西魏与北周,继续沿着魏孝文帝的改革道路前进,又对鲜卑的部落兵制加以改革,于公元550年建立了府兵制。从此,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

便构成完整的新制度，代表着封建制度划时代的新发展，再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威力。应当看到，这正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鲜卑族完成封建化过程的伟大创举，因循守旧的东晋南朝统治者决不可能如此推陈出新。因此，北朝统治者以正统自居，竟把南朝列入荒服，看作蛮夷，并以蒸蒸日上愈来愈占压倒优势。而南朝也再不敢以妄自尊大自诩，终于甘拜下风，开始向北朝学习了。南朝梁武帝萧衍派陈庆之北赴洛阳，归来后对中原赞不绝口，甚至在羽仪服饰上，也仿效魏法，以致“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足见全国大统一的条件业已具备。北周武帝宇文邕是鲜卑族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继续改革，完善各种制度，于公元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揭开了全国大统一的序幕。

八 隋唐大统一

从公元 581 年隋统一全国至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史称隋唐时代。这是继秦汉大统一之后的再次大统一。其全盛时期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咸海,南及今越南北部,北达贝加尔湖以北的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上游。表明中国和中华民族在这时已从雏形发展为成形,无论是疆域,还是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隋唐时代都远远超过了秦汉时代。其主要原因在于隋唐借以建立的基础比秦汉更扩大、更扎实。

首先,隋唐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大融合的全部积极成果,又加以升华,以崭新的面貌统一了全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采用新形式恢复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有力地促进了直轄州县的绝大多数人消除残留下來的民族或地方差别,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名称依旧,但分布面积扩大了,从辽河流域到

珠江流域,从沿海地区到河西走廊和四川盆地,都成了汉族居住区。汉族结构更新,人口也大量增加。公元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国家编户高达841万户,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内迁民族带来的所谓胡谷、虜小麦、胡服、胡饼、胡床、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等,也都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使汉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焕然一新,甚至日常生活用具和服饰都起了根本变化。如桌椅的广泛使用改变了秦汉席地而坐的习惯,服装上也将胡服的褊窄紧身、圆领、开衩等特点吸收过来形成唐代的“缺胯袍”、“四袂衫”等等,足见汉族再次发生了脱胎换骨性的变化,于是带来了隋唐的大发展。

其次,全国中心地区的范围再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又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修建,直接沟通了东西走向的永定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遂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这样一来,水陆交通互相配合,致使如此广大的先进地区更加紧密

地维系为一体,更增强了中心的实力,使中心地区足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仅仅列举这两点,即可看出隋唐大统一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隋唐统治者与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得较为开明。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自我标榜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实际上以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隋唐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也并非一味武力征伐,而主要采取羁縻州府统治政策、德化政策与和亲政策,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唐初与东突厥的战和关系就是最好的体现。

公元6世纪末,突厥强大,征服了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区,建立起以游牧为主的奴隶主贵族政权,虽在隋初分裂为东、西突厥,但对唐朝依然是严重的威胁。唐初,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10万骑兵直逼渭水之北,与唐太宗会盟于渭水便桥并获得大量金帛后方才退兵,足见其气焰之嚣张。公元629年唐出动十万精兵,分六路出击,一举消灭东突厥,生俘颉利可汗。唐太宗对东突

厥人待遇优惠,挑选部分首领委任京官武职,数量竟占当时朝廷武官之半数,因此而迁居长安者近万家;对内徙的突厥部众与汉人同样对待;妥善安置归附的突厥部众,按其原部落分处于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沿边塞下,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加以管辖。将颉利可汗所统故地分置六州,受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即使被俘的颉利可汗也封为右卫大将军,死后还追封为归义郡王。唐对东突厥的正确处置,大大提高了唐的威望,对北方各民族产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公元646年,唐灭薛延陀,漠北铁勒诸部各遣使入贡,请求唐设官府;接着回纥等十一部首领亲自到长安朝见,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也请求唐置官府。于是唐太宗效法西汉,确立起对边疆各族首领的册封制度,遂以回纥部地为瀚海都督府(今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上游)、仆骨部地为金微都督府(今鄂嫩河上游)、多滥葛部地为燕然都督府(今乌兰巴托以北)、拔野古部地为幽陵都督府(今克鲁伦河下游与石勒喀河下游)、同罗部地为龟林都督府(今布里亚特

东南部契科伊河以南一带)、思结部地为卢山都督府(今蒙古前杭爱省)、以浑部地为皋兰州(今蒙古南部)、斛薛部地为高阙州(后改名稽落州,今贝加尔湖南)、奚结部为鸡鹿州(今布里亚特东南部契科伊河以北)、阿铁部地为鸡田州(今贝加尔湖南)、思结别部地为蹄林州(今蒙古杭爱省西北)、白霫(ㄒㄧ 习)部地为阆颜州(今蒙古东方省东南部)、以契必部地为榆溪州(以契必部原在甘凉之间,后转徙漠北地区,与多览葛部相邻,公元653年于其部置贺兰都督府)。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并于故单于台(即受降城,在今内蒙古锦杭旗东北、乌加河北岸)设置燕然都护府加以统领。嗣后不久,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东西的骨利干部及其以东的俱罗勃部也遣使到长安朝贡,唐以骨利干部地为玄阙州、以俱罗勃部地为烛龙州(后改名余吾州)。公元648年结骨(黠夏斯)首领亲自入朝,唐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又以霫部地为居延州(后改居延都督府,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以北)。公元650年,唐灭车鼻可汗,将其众安置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

山),设置狼山都督府。以车鼻子羯漫陀(为拔悉密部吐屯)地为新黎州都督府(今蒙古乌布苏诺尔省)。公元650年,置瀚海都护府统领突厥部众。公元663年,徙燕然都护府于漠北回纥牙帐(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岸),改称瀚海都护府(后又改安北都护府),而迁原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古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更名云中都护府。以大漠为界,漠北诸羁縻府、州隶瀚海都护府;漠南诸羁縻府、州隶云中都护府(后曾改名单于都护府,最后合并于安北都护府)。至此,大漠南北直抵贝加尔湖北部和叶尼塞河上游全部隶属唐的版图。唐应各部落的要求,特地修筑了一条沟通大漠南北的驿路,沿途设置68个驿站,以加强大漠南北与内地的联系,当地各族称其为“参天可汗道”。

西突厥霸有西域,不仅隔断了“丝绸之路”,又直接威胁唐西境的安全。为扫清击败西突厥的道路,唐于公元635年出动六路大军反击吐谷浑,立诺曷钵为可汗,封河源郡王,妻以弘化公主,从此吐谷浑从属唐朝,相安无事。正当此时,西突厥内乱,先由

两可汗争斗,最后演化为十姓部落互相攻杀,于是受西突厥奴役的各族纷纷相叛归唐。公元630年,离唐西北境最近的伊吾城(今新疆哈密)首领以所属七城归附,唐即在其地设伊州。公元640年,唐灭汉人统治的高昌,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并于西州城(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置安西都护府。公元644年,唐灭焉耆,置焉耆都护府。公元648年,唐灭龟兹,葱岭以东诸国皆摆脱西突厥而与唐结好,唐于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设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托克马克城附近,开元后改为焉耆)四镇,并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领四镇。公元657年,唐灭西突厥,分西突厥东部地置昆陵都护府,统辖碎叶州以东地区,相当于今巴尔喀什湖以东至新疆准噶尔盆地及伊犁河流域;分西突厥西部地置蒙池都护府,统辖碎叶州以西地区,相当于今楚河以西直抵咸海的广大地区。后来唐又在天山北路设置北庭大都护府于庭州,统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辖境东起阿尔泰山,西达咸海,北抵额尔齐斯

河上游,南至天山;在天山南路设置安西大都护府于西州,统领原安西都护府所辖地区。至此,唐的疆域一直延伸到今里海东岸和西岸。唐在这里设置的府、州,基本上是册封当地各族的酋长或国王为都督、刺史,维持各族的现状,不征赋税徭役,不强制推行唐的制度,充分体现出“随俗而治”的精神。

东北地区,自公元 669 年灭高丽后,即置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今辽河,东至今朝鲜半岛中部,北抵今吉林东南部,南至大海,共辖 9 个都督府、42 个州、100 个县。在今黑龙江流域,原为靺鞨七部之一的黑水靺鞨日益强大,分为 16 个部,自今松花江口下,沿黑龙江两岸直至鞑靼海峡、鄂霍次克海,皆为黑水靺鞨居住区,唐在其地设黑水都督府。唐朝武后统治时期,原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靺鞨,在首领大祚荣率领下,集靺鞨、高丽之众,至太白山(长白山)东北奥娄河(牡丹江上游),在东牟山下筑城而居(即今吉林敦化附近),开土拓疆,大量吸收挹娄、扶余、涉貊、沃沮等,建立起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自称震国,都上京

(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与唐通好,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地为渤海都督府,任命大祚荣为都督。大祚荣接受册封后,改称渤海。渤海最盛时辖境北至黑水靺鞨,南以泥河(龙兴江)与新罗为邻,东濒日本海,西接契丹,共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号称“东海盛国”。与唐关系密切,其制度文化,皆以唐朝为楷模,历时228年,至公元926年为契丹所灭。黑水靺鞨以西为室韦地。室韦分五部,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石勒喀河下游傍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唐设室韦都督府。渤海之西为契丹、奚部游牧区,于唐初同时请求内属,唐在契丹地置松漠都督府,又以其别部为峭落等八州;唐在奚部地置饶乐都督府,又以其别为弱水等五州。并于营州城(辽宁朝阳)置东夷都护府加以统领。因都护常由校尉充任,故亦称东夷校尉。其辖境包括今辽宁省西拉木伦河与其支流老哈河流域以及河北省滦河中游地区。

隋唐时代,活动于江汉地区南至岭南地区的民族主要有蛮、僚、俚等,他们大多与汉族杂居,且又以姓氏或地区号称,所以

就更为复杂。隋唐先后在今湖南、湖北和四川东部的蛮族聚居区置锦州(湖南麻阳)、溪州(湖南龙山)巫州(后改叙州,今湖南黔西)、辰州(湖南沅陵县)、开州(四川开县)、通州(四川万县)、信州(四川奉节)等。于今贵州及与其毗邻的广西蛮族居住设置州县,如在东谢蛮地区置矩州(贵州贵阳地区)、应州(今贵州省台江、雷山、三都、榕江一带);在南谢蛮地置庄州(在应州南);在西赵蛮地置明州(今贵州省贞丰一带);在牂柯蛮地置牂州(今贵州省余庆、瓮安、凯里一带)等。岭南地区为汉、蛮、俚、僚杂居区,冼冯家族中的冼夫人在稳定岭南局势中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冼夫人(公元512—602年)是岭南高凉(广东阳江西)人,出生于世为南越首领俚族世家,与南朝罗州刺史冯融之子冯宝联姻。她凭借冯氏家族的政治实力与自身为俚族世家的特殊社会关系,在岭南地区展开维护祖国统一、稳定岭南局势的活动,使岭南地区顺利地推行郡县化,特别是海南岛设郡,冼夫人起了决定性作用。隋在岭南设20余郡,唐在岭南设置93个羁縻州,并设置岭南、桂管、

邕管、容管、安南等五经略使，号称岭南五管。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隋至唐初，今云南省和四川凉山地区，依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多民族杂居，各有份地。除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外，在今洱海地区有东西洱河蛮；在今金沙江以北至四川盐边县有松外蛮；在今云南西北有磨些蛮；在澜沧江以西有望苴子蛮、望蛮；怒江以西有寻传蛮；在今枯门岭以西有裸形蛮；在云南西部及南部有茫蛮、金齿、银齿、漆、齿等；在今凉山有勿邓、两林、丰琶等。唐在这里设立了很多羁縻州县，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刺史、县令，分别隶属于郎州都督府（治郎州，即今云南曲靖西北）和嵩州都督府（治越嵩，今四川西昌）。公元652年，废郎州都督府，另置戎州都督府（治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和姚州都督府（治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分别管理云南东部和西部地区。正当此时，乌蛮向洱海地区移动，在征服白蛮、河蛮之后，逐步形成六诏。诏即乌蛮语王的意思。六诏就是势力相当而又互不统属的六王，其中蒙舍诏地处最南，故称南诏，与唐的关系最密切，唐

为扼止吐蕃向洱海地区扩张,确保西南地区的安全,遂采取扶植南诏的政策,于是南诏渐渐强大起来,统一六诏,建立起拥有今云南省和四川南部的奴隶制大国。公元738年,唐玄宗赐南诏皮逻阁名“蒙归义”,册封为云南王。南诏为西南地区能与吐蕃抗衡的唯一大国,故成为唐与吐蕃在西南地区进行斗争的焦点,南诏也摇摆于两者之间,但基本上臣属于唐。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发动政变,灭蒙氏,南诏至此灭亡。

在西藏地区,活动在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隆河谷的雅隆部于公元6世纪逐步兴起,以武力吞并了西藏中部与北部的苏毗。公元7世纪初,赞普(王)松赞干布(汉文史籍称弃宗弄赞)即位后,又出兵征服了今西藏阿里地区的羊同和青海玉树地区的孙波,第一次统一了西藏地区。于是迁都逻些(拉萨),确立文武官秩制度,制定法律,创造文字,建立起奴隶制的吐蕃王朝,从此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641年,应赞普松赞干布的请求,与唐文成公主联婚,唐高宗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公

元 710 年,赞普墀德祖赞又与唐金城公主联婚。两公主进藏,带入唐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西藏的发展,至今西藏山南地区还盛赞文成公主教会了耕田和纺织刺绣,足见影响之深。现在依然耸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当时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据文献记载,从公元 634—846 年的 212 年间,唐藏使节往来 191 次,其中唐使入藏 66 次,蕃使来唐 125 次,由此可见,西藏已与内地联为一体,实际上进行着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当然唐、蕃统治者也进行过多次战争,在西北,吐蕃征服吐谷浑和诸羌,逼唐放弃安西四镇;在西南,吐蕃征服诸蛮,威逼成都平原。吐蕃与唐相较量。表明吐蕃是不容忽视的民族成份。

九 势均力敌

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至公元1279年元重新统一全国的372年间,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经历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北宋、辽、西夏并立时期(公元960—1127年)、南宋、金、元对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其特点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引起全国各民族对封建农业的重视,以至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如辽、西夏等,也走向农牧并重和农牧结合的道路,从而导致封建化过程向边疆民族地区的纵深发展,其结果是使全国各地区的绝大多数民族在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同时,发生了继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再次民族大融合,酝酿着新的更大的全国大统一。

唐朝中期以后,庶族大地主逐渐挤垮了小农的统治地位而居于压倒优势,重新构成封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再加上民族矛盾的发展,终于呈现出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制日益削弱,统一的、多民族

的国家又面临瓦解状态。王仙芝、黄巢于公元 874—884 年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藩镇割据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终于酿成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正当此时，突厥族的一支沙陀部进入中原地区，于割据混战中叱咤风云，先后建立了“五代”更替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政权。特别是契丹族兴起后南下，更加剧了中原地区的战乱，曾一度起主宰作用，甚至左右着五代的更替。五代时，居住在西北和东北的突厥、吐谷浑、契丹、奚、室韦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杂居，而五代更替中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又大都仿照汉唐模式，并统统实行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据《新五代史》记载：后唐政权任职的 147 名官员中，汉族 73 名，少数民族 10 名，其余民族成份不明；后晋任职的 85 名官员中，汉族 73 名，少数民族 6 名，其余民族成份不明；后汉任职的 39 名官员中，汉族 33 名，少数民族 3 名，其余民族成份不明。既然官员由多民族构成，那么，军队就更由多民族构成了。至于通婚和收养义子，无论上层或平

民，均打破民族界限。可见当时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并不严重，因此，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快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了。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首领赵匡胤采取“陈桥兵变”的形式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改国号宋，定都汴梁（河南开封）。他鉴于藩镇割据的教训，并为杜绝类似“陈桥兵变”事件的发生，所以在北宋建立后不久，便断然采取了“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的措施，制定军事制度时又想方设法使将兵分离，遂造成宋军事方面的极度虚弱。同时，北宋伊始就“不抑兼并”，“不立田制”，故兼并之风盛行，无法确立小农的统治地位，这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基础。所以北宋仅只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并未完成全国的大统一。

严格说来，北宋应属于南方国家。北宋最盛时的疆域仅达今河北省中部，北宋建都今开封市，是由于开封正当南北大运河的中枢，南半个中国的物资都可经由汴河运来的缘故。正如《宋史·河渠志》所述：“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

路而进。”从汴河成为“建国之本”看，北宋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在南方。南宋就更毋庸说了。两宋对北方民族只会退让求和，一筹莫展，而对南方民族却进行着有效的统治，或与汉族地区一样设立州县进行直接统治；或设立羁縻州县，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土官进行间接统治，宋设立的羁縻州共约 263 个。

宋境内的南方民族，除泛称蛮、獠外，还出现了苗、瑶、仡佬、壮、黎、畲等具体族称。苗由“五溪蛮”分化而来，主要分布在荆湖北路（今湖北省）、荆湖南路（今湖南省）、夔州路（今川东鄂西）。在羁縻州统治下，封建领主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瑶族称谓最早见《梁书·张纘传》，宋代瑶族主要分布在荆湖南路的辰州（湖南沅陵）、沅州（湖南芷江）、靖州（湖南靖县），广南西路、东路的桂阳（湖南桂阳）、连州（广东连县）、贺州（广西贺县）、韶州（广东韶关），大分散小聚居，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分散在平原地区者，已由封建领主经济走向封建地主经济，而聚居于深山重溪中的，还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壮族来源于古代越人，以僮或撞为

族称,始于南宋,集中分布于广南西路(广西),大部分聚居,小部分与汉、苗、瑶、仡佬杂居。宋在设立羁縻州县建立土官统治的同时,又加强封建隶属关系,遂在僮族中形成封建农奴制的“主户”(世袭土官)、“提陀”(被束缚于土地的民户)、家奴三个等级。黎族之称始见于唐末刘恂撰写的《岭表录异》,主要分布在琼州(今海南省),宋在黎族地区设土官统治,顺俗而治,黎族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向封建社会转化。畬族称谓始见于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畬记》,主要分布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从畬族内部业已分化为“有恒产之民”和“无恒产之民”的记载看,畬族已进入封建社会。

从以上可以看出,宋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是农业民族,宋在城镇或军事要地驻守军队,就足以进行武力控制。宋的贸易重点也集中于西南地区,主要与大理、吐蕃进行贸易,特别是当辽、西夏兴起之后,北路马道梗绝,宋更倾注全力开辟西路马源。北宋在河州(甘肃临夏)、熙州(甘肃临洮)、雅州(四川雅安)设立马市,用牧区生活必需的

茶叶去换取马匹，史称“茶马互市”。可见宋境的农业区已与西南的畜牧区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

吐蕃和大理的状况又如何呢？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原吐蕃统治区陷入彼此不相统属的分裂割据局面。其中较强大的有西藏西部的阿里、甘肃的六谷部和青海东部的唃廝罗等。六谷部和唃廝罗部均曾受过北宋的册封，是宋在西北赖以抵抗西夏的重要力量，与宋的关系极其密切。尤其当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西域到中原的商旅，被迫改道鄯州（青海省乐都），这曾一度为唃廝罗带来了繁荣，更加强了青藏高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正在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吐蕃各部起了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吐蕃的分裂割据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吐蕃佛教即藏传佛教，由于僧人称喇嘛，故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教同样是派别林立，开始向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而寺院上层人物又往往与当地豪族相勾结，互为利用，开始产生政教合一的苗头。

南诏是典型的奴隶制政权，其主要表

现是实行佃人制。所谓“佃人”，是指南诏社会广泛使用于农业的生产奴隶，他们多数是被南诏征服后实行大规模迁徙或被配隶的各族群众，人数近百万，被驱使于各个庄园劳动。每个庄园直径约 30 里，归所在城镇的坐镇“军将”管理，佃人处在严密的监督下，每年“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給禾稻，其余悉输官”。敢乞酒饭者，可用鞭杖活活打死。足见奴隶是在一无所有的暗无天日下生活。公元 937 年终于爆发了以白族牧羊人段思平为首的大起义，推翻了“大义宁”奴隶制政权，建立起大理国。大理国实行分封制，行政区划中的府和郡分封给大臣作世袭领地，行政区划中的部则分封给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通过分封，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封建制，奴隶变成了农奴。但分封也造成了大小封建领主割据的消极后果，为尔后形成土司制度提供了温床。大理国基本上承袭了南诏的疆域，东至今贵州普安，西至今缅甸杰沙，南至今越南莱州省境的黑河，北至大渡河。大理主动臣属于宋，并始终与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唐末之乱，

在游牧的同时，又建城镇罗集汉人以为农业基地，确立亦牧亦农、农牧互补的经济体制，遂逐渐强大起来。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建立契丹国。他征服突厥、吐谷浑、党项羌、沙陀、阻卜（鞑靼）、室韦、乌古诸部，消灭渤海国，统一东北地区和东北民族，于公元947年改称辽，并南下占领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区，建立起从东北到西域包括整个蒙古高原的大辽国。公元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后处于相持状态。辽境内有一个相当大的农业区，使辽不得不采用农牧分别管理的体制，表现为“胡汉分治”，即用契丹贵族去统治契丹族和其它游牧民族，官衙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北面官，凡“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讼、群牧”之事，由他们负责管理；另又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去统治汉人和渤海国人等农业民族，官衙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南面官，凡“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讼、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处理。这样，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上层便被揉合在一起，从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在实际上既促成游牧民族和农业民

族的杂居，又创造出亦农亦牧的生产方式。如契丹族多从事游牧业，但与汉毗邻的地区，却逐渐转向定居放牧；而很多汉和渤海农民，也同时从事畜牧业。辽上京地区（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翼旗附近）滨临黄河，农牧均适宜，于是上京临黄府便成为民族杂居、农牧协调发展的地区。近年考古发现本地区错杂分布着很多农牧业遗址，说明农牧结合正向边远纵深地区发展。如此广泛接触，深入边疆民族内部，迅速使辽境内的许多民族迈进封建社会，更加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党项羌于公元八九世纪逐渐迁至今陕甘宁边区，唐末日益强大，五代宋初对中原政权时臣时离。公元1038年，党项羌首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史称西夏。党项羌原是游牧民族，“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迁居银夏（陕西横山）后，才逐渐学会了农田耕作，有所谓熟户、生户之分，但仍以游牧为主。党项真正强大，是在攻占灵州（宁夏灵武）、凉州（甘肃武威）、甘州（甘肃张掖）、兴州（宁夏银川市）、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

泉)等发达的农业区之后,故大夏视农业为立国之本。为确保农业的发展,必须改变原来的管理体制,所以元昊在建大夏时,曾仿效北宋建立了一整套包括官制、兵制在内的制度,并制定了西夏文字。选任官吏时,凡属左右侍从等旧有官制,都选用党项贵族;凡仿宋官制,则参用汉人。西夏是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辖境东起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北抵大漠,足以与北宋和辽相抗衡。西夏同样实行农牧结合的管理体制,西夏境内的民族除党项羌和汉人外,还有回鹘人、吐蕃人、塔塔人等。西夏的建立,使党项等民族迅速完成了封建化过程,西夏境内各民族的绝大部分也很快融为一体。

在今新疆地区,回鹘建立高昌王国,故这一支回鹘称高昌回鹘。高昌辖境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河,西通天山西部,南接酒泉,北达天山北麓,首府喀喇和卓(新疆吐鲁番东部),其王早期称阿萨兰汗(意为狮子王),较晚称亦都护(意为幸福为王),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实行封建农奴制。高昌境内除回鹘外,尚有汉人、突厥人、黠戛斯人

等。高昌位于东西方陆路交通的要冲，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很多波斯、印度、阿拉伯等地的商品与内地的商品交换要经由这里中转，高昌的使节和商人也经常来往于辽、宋之间，高昌的统治者甚至亲自参与对辽的贸易，每三年一次，辽上京有专供高昌人居住的高昌营。总之，宋、辽、西夏、回鹘、吐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辽统治下的女真族，系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当时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猛安（部落）谋克（氏族）组织。公元 1113 年，女真族的杰出首领阿骨打（完颜部），把猛安谋克组织改革蜕变为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用以掀起反抗辽统治的斗争。他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头领分别称百夫长、千夫长。公元 1115 年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建都会宁（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是为上京。金奴隶制政权在反辽中节节胜利，于公元 1125 年灭辽。辽灭亡之前，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分辽军西迁中亚，建立西辽。金统治者灭辽后继续南进，于公元 1127 年攻陷汴梁，灭北宋，与南宋构成对峙状态。金为巩固对淮河以北广大

地区的统治,一方面把女真的猛安谋克户陆续迁到北方各地,与当地“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称作“本户”,原有住户称“杂户”,于是以本户为支柱的猛安谋克制,便成为各地区合军事编制、生产单位、地方行政组织三者为一体的统治机构,用以稳定各地局势;另一方面,金朝也只有仿效辽、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机构,设科举制度,提倡尊孔养士。这样一来,女真族便很快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宗室、皇亲、猛安谋克的上层分子转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各地的猛安谋克户也迅速向两极分化,除少数变成地主外,大多数沦落为农民,最后也以民族大融合而告终。

蒙古族来源于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公元9世纪西迁,游牧于今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的漠北草原,直到公元12世纪,尚处在分部林立的混乱状态,主要有蒙古部、克烈部、汪古部、塔塔尔部、篾儿乞部、翁吉剌部、乃蛮部等。其中塔塔尔部最强,故塔塔尔或鞑靼曾是蒙古各部的通称。金统治者对蒙古各部采取分化屠杀的政

策，他们利用塔塔尔部去攻杀蒙古部，以便达到互相削弱、分而治之的目的，金世宗甚至每三年出兵漠北剿杀一次，称为“减丁”。为反抗金统治，结束草原各部的杀伐混乱状态，出身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充分发挥政治军事才能，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于公元 1206 年统一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的库里勒台（大会）上被拥立为全蒙古的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政权。他在国内推行“领户分封制”，颁布“大扎撒”（法律）、创制蒙古文字，推动了蒙古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形成。但蒙古政权很快便转变为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西征与南下交替进行，先后进行三次西征，建立起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这期间又穿插南下，公元 1234 年灭金，公元 1253 年灭大理，为元大统一作了准备。

十 元明清大统一

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空前大统一，开创了元明清三代600余年全国大统一的新局面，从而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推向最后定形阶段。其间元统一和清统一最重要，都起到了别开生面的巨大历史作用。元和清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它们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大成，继往开来，先后把边疆和内地凝聚为牢不可破的整体。这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形成中华民族中的丰功伟绩。当然，在统治阶级的导演下，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可怕的历史灾难也在所难免。下面仅叙述在中国和中华民族最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历史片断。

创建行省制度 元统一后，由中书省统镇全国行政。当时元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以至“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

于内地”。为对如此辽阔的领土进行有效管辖，遂把以往出自军事行动需要而带有临时性的行省建置，作为行政制度固定下来。所谓行省，即行中书省，最初含义为中央机构到地方上仍然行使中央机构的权力，后来转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具有固定辖区，凡辖区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朝除“腹里”外，共设十个行中书省，简称省或行省。明清沿袭元制并作了重要改革，改变行省军政合一体制为只管民政，省作为中央机构的含义也完全消失了。清朝设置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八个省，清朝末年，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又新设置了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五省，全国除青、藏、蒙古地区外，共有二十三个行省。足见行省的创建设立对巩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抗击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土归流 元明清时代，在南方诸省，居住有藏、罗罗（彝）、哈尼、磨些（纳西）、栗

粟、保黑(拉祜)、阿昌、民家(白)、羌、俅人(独龙)、百夷或摆夷(傣)、仲家(布依)、怒、蒲蛮(布朗)、哈瓦(佤族)、毛难(毛南)、攸乐(基诺)、巴苴(普米)、山头(景颇)、苗、僮(壮)、瑶、黎、水、侗、仡佬、仡佬、越(京)、土家、东番(高山)、畚、崩龙(德昂)、回、蒙古等 30 多个民族。其中除与汉族杂居,经济结构、政治组织同于汉族外,其余大部分还处在土司土官的统治下。土司土官是长期实行羁縻政策的结果。土司是接受皇帝封赐官号、自王其地的头人;土官是被委任为世袭土知府、土知州、土县丞的头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占有土地、独霸一方的封建领主,而个别土司如罗罗地区的土司则是奴隶主。因此,南方民族多数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罗罗地区处于奴隶社会,处于偏僻山区的民族,如云南的俅人、怒、栗栗、哈瓦、蒲蛮,海南岛五指山中的黎族,台湾的东蕃等,尚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公社制度。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土司土官的弊端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招抚和安定边远少数民族各部的积

极作用,故从明朝已开始废除利用土司土官进行间接统治的制度,改由中央委派的流动性官吏进行直接统治,定名为“改土归流”。清朝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分别采用大军压境强制改土归流与招抚土司献土纳田两种办法,很快便完成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改土归流,但处于边远地区的某些民族,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着土司制。清朝改土归流的推行集中于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主要包括“除其土官,破其割据,去其陋规,科田纳税”等,因此,在改土归流后,南方很多少数民族迅速由封建农奴制转变为封建地主经济,更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实现了国家政令的统一。可见改土归流符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

在西藏设官建制 元朝把藏族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并大力尊崇萨迦法王,企图以宗教力量去统治吐蕃。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初名总制院)事,“管领释教僧

徒及吐蕃之境”。在宣政院管辖下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管理今西藏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其下又设立十三个万户府，还广置驿站、兵站，以便在各地清查户口、厘定赋税、驻屯军队。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从此，西藏正式隶属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特别是清朝，更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清在中央设理藩院（1906年改理藩部）总管西藏、蒙古事务。在西藏正式策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公元1653年）和班禅额尔德尼（公元1713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公元1751年）。任命驻藏大臣（公元1728年）会同地方办理西藏行政事务。公元1793年清军击退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之后，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西藏事务，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达赖、班禅及各地呼克图的转世，一定要由驻藏大臣监督履行“金瓶掣签”的手续；噶布伦以下的僧

俗官员都是属员，其人选、升黜、赏罚均由驻藏大臣主持决定，他们所主管的大小事务都要报告驻藏大臣并经获准后办理；一切外交事宜，都归驻藏大臣负责处理，噶布伦等地方官员，不得私自与外国联系；藏内喇嘛外出，外地人员进藏，均由驻藏大臣发给执照，限定日期，如此等等。总之，凡涉及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一切大事，也都由驻藏大臣主管处理。这样，西藏就置于中央政权的严格管理下，类似于行省了。这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利的。事实上在元明清时期，西藏社会稳定，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强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

盟旗制度 清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对蒙古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清开国过程中，就将前来归附的蒙古部众，与满洲同样编成八旗，称作“八旗蒙古”，这样，像漠南蒙古科尔沁、喀尔喀等部，实际上已变成满洲共同体的一部分了。而对清建立后陆续归附或被征服的蒙古，亦编设旗、佐，设官总管，但一般称总管旗、内属旗或游牧旗，统谓“内属蒙古”，隶内务府管

理,是皇室的直属领地和私产。其余蒙古,包括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统统称为“外藩蒙古”。对于“外藩蒙古”,清朝的总方针是“归附以增其威”与“众建以分其力”,于是创建了治理“外藩蒙古”的蒙旗制度。从皇太极开始到乾隆年间止,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将“外藩蒙古”编为18盟、201旗。其中漠南蒙古6盟、51旗,称内札萨克;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8盟、64旗;漠北蒙古4盟、86旗。盟旗是在蒙古原有各部基础上建立的,由清政府从蒙古王公、台吉中决定人选,任命旗长,授予土地、牧丁、爵位、俸禄,安置于原有牧区。各旗长各自统帅部属,政治权利世袭。旗与旗之间互不统属,甚至禁止互相交往。旗上设盟,盟有盟长、副盟长,但盟旗间亦无统率关系,盟长和副盟长不能直接插手管理旗内事务,其职权只有按清政府的规定在固定地点召集会盟,而会盟时又必须由清政府理藩院派官员检阅,无非是“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实际上盟旗中的一切军政大事一律由清朝中央政府裁决,盟旗无非是清政府严密控

制下的行政机构而已。清朝在以盟旗为核心统治蒙古族的同时，还采取种种辅佐手段，如用封授爵职以笼络蒙古各部上层人物；用联姻婚娶手段来巩固满蒙联盟；用朝贡互市来加强蒙古各地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利用宗教来麻醉蒙古人民，以便进行思想统治。清朝在蒙古地区大力推崇倡导黄教，给予达赖、班禅以及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以至高无上的宗教特权与极其优厚的政治待遇以扩大宗教影响，使蒙古族广大人民笃信黄教，这不但达到了进行思想统治的目的，而且还通过增加喇嘛而使蒙族人口自然锐减。果然，在历史上一向以勇敢剽悍、桀骜不驯为特征的蒙古族被彻底制服了，这虽然对巩固边疆、减少蒙古各部间的矛盾争斗起到了作用，但却限制了蒙古族的发展，蒙古族在如此分散编制下很难再成为一个整体了，以致失去往日那种雄姿勃发、纵横驰骋的朝气，而日趋衰落。

平定分裂祖国的叛乱 明朝时，蒙古分为东部的鞑靼与盘据在今新疆北部的瓦剌。满洲兴起之后，从16世纪中叶起，大漠

以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 24 部蒙古先后归附清朝，称为内蒙古；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分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三部，也均已向清朝朝贡称臣，称为外蒙古；阿尔泰山以西的瓦剌部，当时称额鲁特蒙古，分为四个互不统属的卫拉特（部）：杜尔伯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在今塔城一带的雅尔克什尔努拉，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在伊犁河流域。四部中以准噶尔部最强，当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的汗位后，便恃强凌弱，迫逐其它三部，强占了新疆北部（杜尔伯特部归清，按清制编为旗佐后定居于乌兰固木一带；和硕特部迁往青海、西藏；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直到 1771 年才冲破沙俄的重重阻挠辗转返回祖国）。然后又进攻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居住区，控制了整个新疆地区。公元 1688 年（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与蓄谋侵占喀尔喀部的沙俄相呼应，出兵攻占漠北地区，逼得喀尔喀三部几十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朝保护。康熙帝在救济安置喀尔喀三部的同时，命令噶尔丹率众西归，退还喀尔喀三部故地。噶尔丹

非但不听，又在沙俄的挑唆支持下，举兵南侵，深入漠南的乌珠穆沁，逼近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直接威胁清都北京。公元1690年，康熙帝率军亲征乌兰布通一战，噶尔丹败逃，但他继续与沙俄勾结，派人到沙俄提议缔结同盟，声称“借俄罗斯鸟枪六万，将大举内犯漠南”。公元1696年，康熙帝再次率军亲征，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一战，彻底摧毁了噶尔丹的主力。这时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占领伊犁，转向与清军联合夹击噶尔丹，噶尔丹在走投无路下服毒自杀。至此，喀尔喀三部才重返漠北故地。

策旺阿拉布坦掌握准噶尔部汗权之后，经过长期经营与恢复，重又控制天山南北路。从此，清与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较量，直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平定了受沙俄唆使、企图分裂祖国的准噶尔贵族叛乱后，才真正控制了准噶尔部地区。公元1759年，清军攻入南疆，又消灭了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破坏祖国统一、图谋叛清“独立”的“巴图尔汗国”之后，清朝才

建立了对天山南北路的统治权,遂将南疆和北疆合并在一起,设伊犁将军总管军政事务,并统辖归附于清朝的中亚地区以及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各部。伊犁将军下属行政组织,制度灵活,形式不一。对厄鲁特蒙古采用札萨克制(盟旗制度);在南疆采用伯克制;其余采用郡县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其下于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和阗等11城,各设办事大臣或协办大臣一员。各城仍设阿奇木伯克,但取消世袭,改由朝廷任免,同时尽量分散其权力。南疆各城分设伯克,管理本城事务,受各城办事大臣统辖(伯克原为突厥称号,维吾尔族沿用为层层地方官吏的称号)。伯克名号约三十余种,分任诸务,各有专司,改革后仿内地厘定品级待遇,但已不能自成统辖系统。在新疆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又从各地抽调包括满、蒙、索伦、达呼尔、锡伯等民族成份在内的八旗兵作为新疆驻军,驻扎在天山南北两路,并采用军屯、回屯(维吾尔族农民)、户屯(内地农民)、旗屯等屯田形式,以解决军需民食问题,于是新疆局势稳定下来,巩固

了西北边防。

抗击外来侵略 元明时期,倭寇肆虐于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即日本海盗。明中叶以后,侵扰更加猖獗。我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进行抗倭斗争,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各族子弟纷纷参加抗倭队伍,奔赴前线,与汉族兵民并肩作战。如广西就出动了由壮、瑶等民族组成的倭兵。各族士兵虽然语言不同,风俗各异,但都能协同作战,奋勇杀敌,给倭寇以严惩。公元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丰臣秀吉致书高山族,要他们向日本朝贡,遭到高山族坚决拒绝。随后倭寇便大举进犯台湾,高山族人民配合明将击退倭寇,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富饶美丽的台湾引起殖民者的垂涎,西班牙和荷兰相继侵占台湾,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公元1652年台湾爆发了郭怀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锋芒直指殖民者,起义虽遭荷兰殖民者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但斗争火焰并未熄灭,他们致书郑成功求援。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由金门出发,在台湾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支持下,打败荷兰侵略军,迫使荷兰侵略者签投降条约

后退走，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连绵起伏的外兴安岭东迄于黑龙江入海口的广大地区，连同隔海的库页岛，自唐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元属开元路，征东元帅府就设立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明曾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一带地区设卫184处，所20处，统辖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末清初，沙俄东向扩张，侵入这一地区，强占达呼尔头人阿巴西的住地雅克萨，筑雅克萨城作为侵略据点；又强占蒙古茂明安部牧地，建尼布楚城作为侵略基地，并大肆抢掠烧杀。沙俄的侵略行径遭到当地的达呼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费雅喀人、蒙古人的强烈反抗。清朝于公元1685年出兵抗击沙俄侵略，连战连捷，迫使沙俄和平谈判，清朝作出重大让步后，于公元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双方以格尔必齐河、大兴安岭北侧、额尔古纳河为国界。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两岸属清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下游两岸包括库页岛属清宁古塔将军（后改吉林将军）管辖。

综上所述，至清乾隆时，中国的疆域北

起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迄葱岭,表明中国大陆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已达最大限度,预示着以小农男耕女织为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游牧为特征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对立统一也到了尽头,众多的中国古代民族融汇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并经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考验,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十一 中华民族正在振兴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以中国大陆为整体、以中原为中心向前发展的。整个古代历史都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尽管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融化结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但却是不自觉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真实的历史完全埋在荒芜杂乱的历史现象中,当然就更意识不到中国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更没有觉悟到中华民族应该以走向世界来结束自身漫长的古代历史。清朝康熙皇帝曾接触了西方文明,但却没有看到历史发展趋势而产生根本变革的念头。乾隆皇帝则全然沉醉于封建“盛世”的自我欣赏中,昏头昏脑地针对英国说什么“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还谈什么对外贸易?没有对外贸易的刺激,又以什么导致国内生产方式的

根本变革？须知走向世界是从内聚型转变为外向型，意味着发展机制的根本变革，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包含着对古代社会的某种否定，正如孕育中的胚胎与出生后独立生存在大千世界的生命那样，尽管是同一个体的生命延续，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新生是对孕育的否定，何况社会机制的转变并不这么简单。古代社会一切促成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因素都可能变成中国和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羁绊。因此，不从外贸作起点就很难获得转机。其实当时中国具有很多发展为外向型经济的优势。中国东部滨海，海岸线长，一向以造船航海著称。明朝郑和（回族）从公元1405—1433年的28年间，七次奉命出使西洋，先后访问了37个国家，到过60多个地方，最南到了爪哇，最北到了波期湾和红海海岸的麦加，最西到了非洲东岸，越过了赤道以南，比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航路以及达伽马1497年绕过非洲好望角要早八九十年，且在船只制造设备、船队规模、船队装备方面及所到地区之广，都为哥伦布、达伽马所不及。可惜其航海目的只是为了皇室的私利

而不是开展对外贸易或寻求新发展，故郑和航海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也无法和哥伦布、达伽马相比拟。就国内科学技术力量来说，早在宋代我国就完成号称四大发明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后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中国的丝绵染织、造纸、铸铁、制糖、陶瓷、造船等手工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手工作坊或工场也不逊色，其所集中的江南、广东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如此，在中国还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李时珍、徐光启、徐宏祖、王锡阐、梅文鼎等一大批具有启蒙作用的学者。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在英国采取卑鄙的鸦片贸易之前，就一直占压倒优势，如果当时清政府支持扶植外贸、通过外贸来富国强兵的话，中国发展转变为外向型经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而恰恰相反，清政府却采取了海禁和闭关政策，以致坐失良机。中国固有的上述各种优势也倏忽即逝，中华民族只能处在闭关锁国中徘徊不前，清统治者在因循固守的洋洋自得中准备挨打，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中国的大门是侵略者用枪炮打开的。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被迫实行门户开放。在侵略者面前,清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特别是最高统治层,不但没有任何抗击侵略的能力,而且连坚决支持抵抗侵略的勇气也丧失了,远远不如日本明治天皇政府。日本明治天皇政府尚能进行“明治维新”,清朝却不能容纳任何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清统治者已堕落到除了对外妥协投降之外就是在国内施展淫威了,这就决定了封建统治者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过程。中华民族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近百年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运动,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斗争。整个斗争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朝封建旧政体统治下，笼罩着民族压迫的严重气氛，存在着民族隔阂。各民族在共同反帝斗争中深深体会到，保卫祖国是代表各民族利益的神圣职责，没有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便没有各民族的自由和幸福，初步意识到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反帝必须同时反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各民族的共同敌人。第二阶段，推翻清朝之后，正式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名称出现，提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管理国家的“共和”主张，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共和的奋斗目标，求得各民族的共同解放，我国各族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浴血奋战。其特点是被统治的最低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构成滚滚的革命洪流，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第三阶段，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中

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阶级对抗，各民族都变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并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自己当家作主人的自治，在这时中国各民族才构成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正是中国革命步步深入的表现。

从民族的角度看问题，存在着两个极其明显的共同特征。其一，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个整体体现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并以中国和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其它民族发生关系。对中国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侵犯，都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侵犯。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不是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斗争，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斗争。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派，不管是出自哪个民族，都必然遭到本民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反对。其二，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在共同命运下的共同斗争，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所以迎得各族人民的踊跃参

加、全力支援。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凡是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都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模范人物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表述:“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从革命风暴中获得了新生!

经过百余年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和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可以预料,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世纪。我们应该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自强不息,切莫为暂时的落后而沮丧,更不要为一

时的迂回曲折而丧失信心。

朋友们,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努力奋斗吧!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古代民族

作者 =

页数 = 1 3 4

S S 号 = 1 0 5 0 8 3 9 9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